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0月31日第29期 总第23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9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五）

【专稿】

赵建文 往事有据可查——关于“007密令”的《调查报告》

附录一：文革中“007”密令事件（胡宗式）

附录二：“〇〇七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赵建文）

附录三：“除隐患”战斗队的工作（聂元梓）

附录四：2018年10月北大校友在微信群中的讨论（王复兴整理）

张比 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研究与写作的现状与展望

【评论】

舒声 军宣队成员怎样看北大文革

王复兴 朱成昭：一个应该载入文革历史的重要名字

【述往】

杨海峰 五年求学一场梦——我的北大经历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阚玉瑶之死（十六）

【封面】

邹行 前进地后退

【资料】

周培源 1967年6月16日晚在新北大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总部举行的

“彻底批判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本刊声明】

【专稿】

往事有据可查¹

——关于“007密令”的《调查报告》

赵建文

1967年3月至1968年2月，我是“保”聂元梓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42年后的2010年11月，何洛、孟金引用聂元梓在1971年关押时的“交待”材料说我是聂元梓利用“007密令”反对周总理之阴谋的参与者、实施者（见北大《校友通讯》第49期）。由此，我就有必要把我在“007密令”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如实陈述出来。

一、关于“007密令”的《调查报告》是“保”总理的“报告”

“007密令”是一个陷害周总理的事件。“密令”的内容为：令你军区元旦举行游行借此进行政变，署名为“总理”。我是1967年5月从无线电系学生陈振民托人转来的材料里知道这个“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中的坏头头炮制的。当时，我一是让人去湖南长沙调查此事；二是让战斗队成员陆水林同陈振民取得联系。调查人员回来后告诉我：被定为“反动组织”的《湘江风雷》的人正在闹翻案，戚本禹“接见”了送“007密令”的人。6月，我们根据陈振民提供的材料搞了份关于“007密令”的《调查报告》。8月，陆水林主动找陈振民搞了第二份《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报告》的基本材料都是陈振民提供的，其内容为《湘江风雷》头目叶卫东等人在当地公安局看守所的交待材料。我们的《调查报告》一是说明了这个“密令”是如何炮制的；二是指出了“文革首长”戚本禹和军委办事组的“刘××”同这件事有关联。《调查报告》本身的文字，以及材料的提供者和整理者都可以证明这是一份揭露有人在陷害和反对周总理的报告。

¹ 王复兴注：此文赵建文写于2011年2月25日，2011年11月发表于北大《校友通讯》第51期。2016年5月2日，笔者拜访赵建文，赵亲自把此文的影印件交给了笔者。43天之后赵病逝。现刊发此文，以表纪念。

二、向周总理呈送“007密令”《调查报告》的渠道

《调查报告》上送名单是我拟的，毛、林、周和除“王关戚”之外的“文革首长”都在其中。我把《调查报告》和“名单”送到聂元梓和校文革办公室那里，之后就由他们处理了。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两个向总理送材料的渠道：一个是通过老军人王还寿，他是装甲兵部队的，曾在“学部”和“市革委”工作过，是他主动跟我要材料，说他可以把材料直接送到周总理家里；另一个是军事学院教官刘洪周，他说他可以通过军委办事组把材料交给周总理。何洛、孟金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托“王××”送材料，是为了把反总理的行动说成保总理的行动。然而，介绍我认识这两位老军人的以及同我一起到装甲兵驻香河部队找“王××”送材料的人现都健在，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上述的两个方面，即“保”总理的《调查报告》、我向总理送材料，所述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

注：赵建文是1965年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的年青教员。文革中他担任除隐患战斗队的队长，在与吴传启、林杰，以及与他们后台王、关、戚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清查“5·16”时，赵建文被迟群、8341驻北大工军宣队长期隔离审查，被诬告“反总理”。文革后，1977年1月底，北大新党委对赵建文专案重新作了结论，内容有三：其一，“除隐患战斗队”搞的材料不是反对周总理；其二，有关反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不能立案；其三，对赵建文的原结论予以推翻，材料予以销毁。（该“结论”据2000年《百年潮》第6期赵建文：《一个造反派的文革杂记》）。——王复兴

附录一；

文革中“007”密令事件

胡宗式

所谓“007号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的坏头头对总理的陷害。我在文革中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因工作关系和校外有较多的联系。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纲（北京机械学院学生）找到我，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即有关007密令问题，湘江风雷头头的上报材料）转交江青。材料的大致内容如下：

在1966年12月初，“湘江风雷”的一个成员在湖南省军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门内驶出，从车上掉下一张纸，他拾起后，发现是一个字条：

密令	007号
兹定于12月30日在……起事	
手谕	

他把这个字条拿到湘江风雷总部，头头们用“雷锋日记”对笔体，认为是总理的字体，便认为总理利用湖南省军区搞军事政变，整材料上告中央。后来中央“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平反）。坏头头认为是总理搞的报复，“湘江风雷”的头头张辉便整材料。材料中说密令怎么发现的，军区的人怎么追查，他们曾经把它藏在蚊帐杆里，被人盗取，又怎么追回。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纲的这份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纲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工宣队是8341部队，迟群、谢静宜为主要领导。审查我的目的是要我承认我是“5.16”，并说：“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他们把“5.16”的一些罪行无端

地加在我的头上，把炮打谢富治也作为“5.16”罪行来整我。搞我“007”问题专门用了3天，非逼我承认是反总理。我坚决不承认。他们说：“戚本禹用它反总理，材料是你提供的，你就是反总理”。我说：“我上交材料给的是中央文革，并且我在上面注明了我的态度。如果我在上面写的是给戚本禹，你可以算我反总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附录二：赵建文生前所写一份材料：

“00七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

赵建文

文革当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背后，就是中央文革和江青做后台。我们呢，就是认准了，国务院不能动，周总理不能反，我们是要坚决地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

我们不但有思想，还有大量行动。我们除隐患战斗队专门组织了人员，调查搜集了与关锋有密切关系的吴传启一伙的材料，并且多次向周恩来总理上报有关情况，聂元梓就面向周恩来递交过这些材料。我们自己也几次通过周恩来的（前）卫士长，向周总理转送我们收集来的情况。

这其中，“00七密令”是最重要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地，是在湖南省会长沙。文革初期，湖南省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湖南省高校红卫兵司令部，是以高等院校学生为主的，支持省军区，被认为是“保守派”；一派是湘江风雷，以工人居多，是造反派组织，人员成份比较复杂。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表批示说：“湘江风雷的头头有问题。”省军区根据这个指示，就抓了湘江风雷的头头，并且进行审讯，查出了一件“湘江风雷”的头头参与陷害周恩来总理的“00七密令”事件。

所谓“00七密令”，是诬陷周总理要搞政变的一份手令。事情的起因是：长沙铝厂的

工人葛某某捏造说，一九六六年冬，他在湖南省委门前看到开出来一辆摩托车，从车上掉下一份文件，被他捡到了，上面写着：拟于元月一日起事……手谕。葛某某说，他用当年中央几位领导人给雷锋日记的题词对照，从字体上辨认，这和周总理给雷锋题词的字迹很接近。葛某某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湘江风雷，并且说，这密令本来被他藏在支蚊帐的竹竿里，结果被人偷走了。湘江风雷就马上派人坐飞机飞到北京来，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重要情况。陈伯达派人听取了有关秘报。后来，湘江风雷的一个头头到北京来，住在洪涛处，写了一份关于“密令”的诬告周总理的材料，戚本禹派人取走了这份材料。

很显然，这是一起陷害周总理的阴谋事件，所谓“手谕”，根本不存在。编造的谎言是很容易戳穿的。奇怪的是，湖南省公检法追踪有关线索，追到北京，其中就追到洪涛等人。他们到公安部去，要求调查洪涛等人，公安部却说洪涛是左派，不许调查，把他们挡了回去。

正巧，湖南省公检法的人员在北京调查期间，看到了《新北大》刊登四月中旬孙蓬一关于揭露潘（潘梓年）吴（吴传启）洪（洪涛）刘（刘郅）问题的讲话，他们从中了解了“新北大公社”对于洪涛等人进行批判的态度，就主动地来与我们联系，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追查和澄清所谓“00七密令”的真相。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很快就搞了一份调查材料，就是关于“00七密令”的第一号报告，由聂元梓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在首都机场迎接外宾的时候直接交给邓颖超。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五六月间。为了抢时间上报，调查报告中的部分证词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拍照，只是抄写一份留底，就把原件在第二天交给邓颖超了。

我们调查关于“00七密令”事件时，就发现戚本禹和林杰插手了。上送周总理的第一份报告，我们没有敢把戚本禹写进去，因为怕惹出麻烦。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际，王力和关锋已经被打倒了，林杰也完蛋了，有同志提议就“00七密令”事件再写一个报告，把有关林杰和戚本禹的材料写进去。第一号报告和第二号报告的区别就在于此。当然，执笔的同志仍然采取了防范策略，写了戚本禹插手、派人去取陷害周总理的材料的这一段以后，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说“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以免万一

被戚本禹知道，加害于我们（当时戚本禹还是中央文革成员）。

我们还到香河去，当时周总理的前卫士长住在香河，我们委托这位前卫士长向周恩来总理转交我们收集到的有关材料，要周总理知晓那些人对他的诬陷。我们还通过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的同志，向周总理转交过有关的调查材料。■

附录三：

“除隐患”战斗队的工作¹

聂元梓

1967年4月组建除隐患战斗队就是为了搞吴传启们的材料，和他们作战。许多优秀的同志参加了这样的工作。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

队长赵建文（哲学系教师），副队长潘国华（国际政治系教师）。战斗队大约20人，工作颇有成效，自身的安全也做得不错。“除隐患”战斗队，在工作中有严格的纪律，不是什么材料都要，什么人都搞。最高只是搞到吴传启。林杰的材料不整，更别提关锋和王力。关锋和吴传启联名的文章一概不取。这样，不可能从除隐患战斗队抄出整王力、关锋的材料。队员们怀着保卫周总理的决心、顶着二月逆流派的帽子，和王关戚极左势力作斗争。在陈伯达6.5讲话以后，只有一个人造反上了“井冈山”，他没有也不可能揭发出什么钢鞭材料。

“除隐患”工作期间大约整理的材料46篇，大多上报，有些发表了。宣传队进校以后，材料被收走了。现在整理不出这46份材料的清单，是个遗憾。

1967年秋，王力、关锋倒台后，学部的造反派头头王恩宇被对立的一派抓起来了。我们通过联系，参加了学部审王恩宇。当时在场十几个人，北大的两人。王恩宇讲了大量

¹ 此文摘自聂元梓的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第九章。

戚本禹的材料，讲戚本禹保卢正义的问题。并且暗示康生也是保卢正义的。但是，当时就很难继续追查下去。

审过王恩宇，回来向我汇报，讲了戚本禹的大量问题。我说，看戚本禹应该跟他们(王力、关锋)是一伙的。这些材料要不要向上报，我拿不定主意，就说问一问高等军事学院的人——高军院的几个人，在文革初期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同时，他们有自己的资讯渠道，联系很广。我们有些事情拿不准，就向他们征求意见。我们把关于康生的事向他们讲了，问他们应该怎麽处理。他们就要求先听一听审问王恩宇的录音（学部的人录音）。他们来了两个人。穿着便衣，到了北大十三公寓。结果呢。听到关于康生的部分，录音没有了。他们问怎么没有继续录。赵建文说，敢继续往下问吗？我说：你们说应该怎麽办？他们说，有些事情是要看火候的，要在适当的时机往上报，你往前赶了一点儿，就是反动，你稍微等一等，再报上去，就是功臣。

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见好就收了。“除隐患”也不能继续存在了，因为已经涉及到了康生，你不解散，人家就认为你不只是在搞康生了。追究王、关已经给我们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若是再惹着康生等，那恐怕只会是自讨苦吃。“除隐患”战斗队也就解散了。

到1968年1月，戚本禹也垮台了。“除隐患”的一个同志，用“迎春到”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布了戚本禹的一些罪行，主要内容是戚本禹如何利用反击二月逆流，来反总理。这可以说是“除隐患”的余音了。

赵建文先生于2016年6月14日不幸病逝，我非常惋惜。■

附录四：

2018年10月几位北大校友在微信群中的讨论

王复兴（原历史系）：刘若，今天见到启之，聊了挺长时间。他告诉我：北大哲学系

有一位姓陈的老教授，曾经是聂元梓专案组成员，看了《记忆》上李清崑老师关于国际饭店会议的文章以及夏、高二老师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文章，找他，要谈谈，还建议到他家里谈。启之建议这位陈先生写文章，但他不打算写，只想谈。我对启之讲了几点感觉：这个姓陈的原来是专案组的，是整人的。陈有看法却不写文章，大概是想让《记忆》采访他，他想少担些责任吧？我说看过樊 xx 写的一篇文章（指他一个人搞的电子版的《北大文革简史》，东拼西凑了许多材料，杂乱无章），该文引用了许多陈的讲话，从中看出陈曾是迟群专案组的，后来邓小平执政，陈又是新党委搞清查专案的，把迟群整聂的材料又搬到文革后的清查专案组使用。樊大量引用陈说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搞不清他们二人是谁在说。顺便说一下，樊的那个《简史》，充满派性，有许多不实之词，并引用陈的话进行人身攻击，没什么史学价值，对其派性更不值得理睬。但他们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应关注，准备应对其对历史的歪曲。我计划明年出版《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将选用李老关于哲学和《背景》二文及夏、高两位老师合写的大作。我十一返美。再聊。

刘若（原无线电系）：复兴，我已回京，同意你的观点！这个陈某与彭佩云关系密切。以下转李老前不久发我的短信：据原北京市委大学部庞文第交待：哲学系“陈志尚把左派（提意见的社教积极分子）比做右派分子，我感到不妥当，不能把左派比做 1957 年的右派，曾建议他作修改，可是他很坚持，不肯接受我的意见。”（据庞交待材料第 46 页）。

刘若：复兴，再转李老所言：陈是哲学系教授，也是国际饭店会议的参加者，他是批判社教积极分子的重要人物，曾主张将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当时连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干部也不同意他的意见。由此可知，陈不是个善主。

刘若：我估计樊与陈对过话了，只是不想告诉启之。

王复兴：樊、陈确实已对过话了，樊在他那个只有电子版的《简史》中已大量引用了陈的对话，并与樊的述说混杂在一块儿，搞不清谁的话。这位哲学系的陈 xx 原来在陆平时代的国际饭店会议到迟群的清查 516，再到邓时代的大清查、大报复，一直充当打手，整人。樊为了派性需要，攻击李老，不惜从陈某那里找弹药。如不同意对国际饭店会议的分

析与史实，站出来辩论嘛！以上我所述，与吴迪所说的将来时，应是两条不同的线路。

黄兰（原化学系，赵建文夫人，文革时“除隐患战斗队”成员，后为北大化学工程系教授、高级工程师）：王复兴，你好！这陈 xx 就不是好东西，我现在见了他都敢当面斥责他，当年他整赵建文，诬蔑说赵反周总理，搞逼供讯不说，他竟和几个 8341 的军宣队的人跑到我劳动锻炼的固安县，让我揭发赵，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就持续审问我七、八个钟头，也不让吃饭，直到固安县委陪同来的人都火了，他们才说要把我带走到北京，去找赵建文放衣的箱子。箱子存放在赵的姐姐家，他们说里面肯定有反总理的材料。我气坏了，自己跳上他们的吉普车，走，回到北京，直奔那个箱子。我把箱子扔到他们面前，随便翻吧，结果里面只有几件我的破衣服，连个纸条也没有。后来在不同场合（北大校园或食堂），赵建文和我都当众骂他。他要是还造谣整人，一点也不奇怪。

李士坤（原哲学系教师）：黄兰，陈 xx 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是一位不甘寂寞又尽做坏事傻事蠢事之人。关于文革和北大之事我意不能与此人交流，无益，他是说不出什么真实情况的。我还依稀记得工军宣队在哲学系开党员会议，要开除老赵的党籍。在这个会上，此人站起来发言表示赞成、拥护。当时明确反对有两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对立派的郭罗基。

王复兴：黄兰，亲历者文集第二集里，我觉得“除隐患”战斗队反极左、保总理的事应写文章说说，后来清查 516 时迟群专案组又颠倒黑白整人，说赵建文反总理，这更应写一下，说道说道。你在固安县遭遇审查之事，就很生动，很能说明问题。开除赵的党籍，二票反对，这事也挺给力。不说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孙厚才（原哲学系）：复兴，80 年代北大竞选人大代表，王军涛和胡平举行答辩会。有人问中国为什么落后？胡平回答：因为中国人不觉悟。第二天上课，这位陈 xx 在课堂上批驳胡平，说：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觉悟？中国人在世界上觉悟是最高的！弄得满堂轰笑。他上课一口上海腔，讲课不怎么样。■

王复兴组稿并编辑 2018 年 10 月 13 日

【专稿】

清华文革历史：研究与写作的现状与展望

张 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清华校友回忆与研究文革的作品相继问世，并以各种方式发表。清华文革是全国文革的一个窗口，披露清华文革的真相，揭示文革中各种荒谬现象产生的原因，总结历史的教训，是每个清华文革亲历者不可推辞的责任。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作品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不足，进一步的深化面临着许多困难。本文试图对已有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做一粗略的述评，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初步建议。

一、成果

1. 一批回忆录（含资料整理）的问世

清华人关于文革的著作最早的是丁抒的长篇著作《浩劫》，在香港出版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虽然主要是针对全国范围的文革史，但为清华文革的研究提供了借鉴。较早的关于清华文革的史料性读物是《孙维藩日记》和邱心伟、原蜀育的《文革亲历 大事日记史料收录》。回忆录则先有陶德坚的《风雨人生》、刘冰的《风雨岁月》。接着，蒯大富、沈如槐、陈继芳、万润南等人的回忆录陆续问世。叶志江的《走出文革》文集是一部重要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搜集整理了百日武斗期间的大量史料。

近年来，高沂、罗征启等原清华干部，曾昭奋、林贤光等教师，还有几十名原清华学生陆续写出了大量的长篇回忆录或长短不一的回忆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清华文革的历史，有的正式出版，有的自费印刷，有的在网上发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清华之外的作者涉及清华文革史的作品也不少，如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原中央文革成员的回忆文章，凤凰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以及原清华附中和其他中学红卫兵的回忆文

章，北大、北航、地质学院、中科院等单位作者的文章。海外作者宋永毅、王友琴等的作品中都有关于清华文革过程及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调查资料。一些记者、作家对清华人士进行了访谈，甚至一些外单位的原造反派领袖如韩爱晶，河北保定的要宝忠等也写出了关于蒯大富的专题著作。这些作品，补充了清华人收集整理资料的不足，但也有的内容不够真实，误差较大，如电视节目中阿忆等人的谈话内容，调查粗糙，想象杜撰的成分较大。又如要宝忠的作品，在事实和观点上都有许多错误。

2. 综合性文集的出版

2013年初，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出版，共90多万字，收录回忆录和论文13篇。2015年初，孙怒涛主编的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历史拒绝遗忘》（上下册）出版，共142万字。收录论文和回忆文章72篇（上册33篇，下册39篇，不含附录）。这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许多国内外图书馆和研究单位相继收藏。特别是后一部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清华人文革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国内外文革研究者给予了重视和好评。一些其他高校的文革亲历者认为，清华人的研究走在了前头，表示要急起直追。可见，文集的出版，体现了清华人的反思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不仅带动了清华校友回忆和研究文革的热情，对国内其他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反思文革，研究文革历史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然，《历史拒绝遗忘》文集的出版，并不代表清华文革史研究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并不表示校友的回忆与反思达到了最高水平，文集本身的编辑水平、写作水平和作者群体的认识水平，仍有更大的提高空间。

3. 个人研究和写作的深化

在长期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许多作者都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可以说，有几十位作者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和评论，只能按照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简单

地分类评述。我以为，就学术文章的研究方法来说，有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大类别，前者以唐少杰教授为代表，后者以杨继绳为代表。

就回忆性文章的写作方法来说，有偏重逻辑思维和偏重形象思维的区别，前者以胡鹏池为代表，后者以叶志江为代表。他们的写作都坚持了较长时间，而且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

唐少杰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9年生，1978年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85年7月毕业后入清华大学任教。2002年8月—2003年7月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他是一位没有文革亲身经历的中青年学者，由于在清华任教而产生了研究清华文革的愿望。但因他有良好的哲学素养，掌握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深入进行社会调查，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写出了多篇有关清华文革的学术论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清华造反派因内战武斗而由盛到衰的过程，是全国造反派衰灭的一个缩影，引起了国内外文革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在复旦大学“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工作坊中的报告《“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分析了清华工宣队的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指出迟谢之流的“教育革命”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唐教授还认真细致地调查了清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情况，写出了《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统计表》，也是一篇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教授的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既有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又体现了客观严谨的学风。他的年轻和非清华出身，既是他的优势，也给他的调查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但他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也为其他研究者和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样本。

杨继绳学长除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方面有大量世界范围影响的研究成果外，对文革史研究也有重要贡献。如《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谈孙耘事件：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等。杨学长虽然也是理工科出

身，但长期在新闻领域工作，又学习了大量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视野广阔，思维缜密。他的论著理论性强，说理透彻，站在理论高度，善于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用新的思想观点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说他是理论研究的代表，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实证性的调查研究，他有长期记者生涯，调查采访是他的长项，他的访谈类文章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胡鹏池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除了乡土文学作品外，近年来致力于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已经有大量作品发表在共识网等网站上，点击率名列前茅。他的作品涉及许多人物，从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又到文革中的蒯大富等。他的文章为什么点击率那么高？主要得益于他擅长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现象入手，层层递进，丝丝入扣，最后寻找出问题的答案，即本质。读他的文章，虽不轻松，但不论长短，均能引人入胜，使人一读就欲罢不能。所以，常常是同一个现象，他却能得出更加符合逻辑的合理答案。对于历史人物，他进行心理分析，从动机到行为到效果，给出适当的评价。对历史事件，多是因果分析，务必“上穷碧落下黄泉”穷追不舍，用证据说话，给出合理的解释。胡鹏池的这种细致严格的写作态度和推理小说式的写作方法，使得他在网络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叶志江的写作是另一条路子。他关于文革的回忆性文章发表的更早，当时产生的影响更大，吸引了海内外大量读者。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大多属于纪实文学类型，不是学术论文。但从《救美》开始，就以流畅的文笔，活泼的语言，幽默的格调，征服了大量年轻读者。《走出文革》中的多数叙事性散文，在不经意间，解构了文革，嘲弄了文革的发动者；以同情和理解，对文革中失去自我的狂热者善意讽刺；对斗争哲学下的混乱状态中的弱小个体的善良人性加以表现和赞美，给予了读者思考的空间。所以，叶的作品如橄榄般经得起咀嚼。尽管他的作品不是严肃的理论文章，更接近文学作品，但因其可读性强，读者面广，可以说一篇《救美》的读者就超过了我们其他作者的所有读者数量。其社会效应不可小看。或者说，在普及文革历史，从而彻底否定文革，走出文革方面，叶的作品功不可没。

二、不足

1. 研究领域存在空白点

多数作品关注于文革的热点事件，如1966年的6.24事件，8.24事件，1967年的两派分裂，1968年的百日武斗，以及热点人物，如部分两派的头头和部分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文革受害者。但对于文革过程中的其他事件，如文革初期的反蒋与保蒋，工作组期间造成的人群撕裂，文革筹委会和清华红卫兵的成立和消亡，外地串联和联络站的作用，普通学生和教师、职工的思想和行为，井冈山专案组对干部群众的迫害等，涉及较少，研究很不深入。从时间段上看，前2年的情况反映的较多，后8年因大部分学生毕业离校，迟谢统治时期的清队、抓516、教育革命、反“右倾翻案风”等反映的很少。

多数作者从亲身经历出发，缺乏深入广泛的调查采访，就事论事较多，纵向的联系和横向的比较研究较少。如文革与九评学习，文革与四清，文革与反右，清华文革与北京高校文革、与北京中学文革，清华两派与全国造反派组织的联系等，都没有详细的调查资料和分析文章。

2. 作者队伍薄弱

作者队伍存在人数少，年龄老化，学识修养不足等弱点。同时，存在着学生多，教师、干部少；原造反派多，原保守派少；文革中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更少等几多几少。有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多数缄默不言。如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和骨干，除阎淮等少数校友外，多没有参与回忆和研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有些知情者离世，应当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工作。而多数研究者和写作者，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没有计划性，也没有组织协调，要使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困难不少。

3. 研究方法相对落后

除杨继绳学长和相对年轻的秦晖教授、唐少杰教授外，多数作者是理工科出身，缺乏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基本的社会调查、统计分析，以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都没有很好掌握。因此，与部分国外研究者如麦克夸法尔及华裔的王友琴、宋永毅相比，与国内的高华、杨天石、杨奎松、徐友渔、张鸣、李海文、董国强（南京大学）等学者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都显得陈旧落后。

三、建议

历史研究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揭示真相，二是给出合理的解释。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方向。今后，这两大方面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1. 继续加强史料搜集整理，让历史的真实浮出水面

目前邱心伟等校友在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参与。除大陆图书档案的检索外，美国一些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料中心也有大量资料，包括电子文档和光盘，有条件时可加以利用。但更要注意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如各种照片、实物和文字材料，并尽快对一些重要人物做录音访谈。

2. 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目前存在的许多空白点，需要填补。缺乏长篇的综合性论著，宏观上的整体把握文革十年。如何写出一部清华文革史，应作为我们的目标。而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可以做专题研究，特别缺乏对文革中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微观研究。南京大学中年教师董国强教授近年来不断就江苏、南京和南京大学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调查采访，写出了多

篇有分量的论文和采访报告，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都有，特别是采访了许多老干部、老教师 and 老造反派，从不同人的视角和记忆中挖掘历史真相和历史中人的思想感情，使南京大学的文革研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3. 研究方法更加先进，边学习边研究写作

杨继绳学长也是理工科出身，他为什么能够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并掌握了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主要还是通过读书学习和学术交流。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多读一些大陆、台湾和海外学者的历史著作，借鉴国内外文革研究者的研究和写作方法，相信在几年内就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去年，复旦大学举办了文革历史研讨会；今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陈坡（57岁，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写出了《文化大革命沉思录》。值得注意的是，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通过征文，遴选出优秀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汇聚成《红祸——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论文集》一书在国外出版发行。收录了十八篇论文，分纵论、横论两大部分。纵论部分中有戴开元的《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徐友渔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张博树的《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毛式文革外交的逻辑走向》、旅美访问学者张杰写的《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香港作家张成觉的《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撰写文章，在其哥哥的《出身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对罪恶历史作出了控诉，并从文革五十周年的角度来反思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等问题。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革过程中的某一命题或某一具体事件作出分析论证。如乔晞华的文章《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胡平文章中从遇罗克遭遇“这样的人不杀，杀什么人？”的悲惨命运，论证了文革的反动本质。最后五篇文章都是论证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有很高的史学考证价值，深入细致，史料详实，逻辑严密，有两位作者是目前在校研究当代史的青年学生。

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联系，以适当的方式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对于提高我们研究和写

作水平，将会有所助益。

4.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互通信息，分工协作

在孙怒涛学长的主持下，编辑出版《历史拒绝遗忘》，是清华校友（以及部分校外作者）团结协作的成功尝试。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怎样深化清华文革研究的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鉴于人员分散，多数年龄较大的原因，宜采取以个体为主，小范围的松散型组织为辅。通讯联系为主，不定期聚会为辅的方式。但一定要定期交流，以便互通信息，共享资源，互相启发，共同提高。避免各自为战，不相往来，信息闭塞，重复撞车的现象。

尽管我们中的多数已经年届七十岁，但看到已过 75 岁的杨继绳学长、孙怒涛学长，还有 80 多岁的林贤光老师等，都还在认真研究，不懈写作，在感动之余，我们不应推脱和懈怠，还应进一步努力，以便还原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完成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

■

【评论】

军宣队成员怎样看北大文革

舒 声

最近，认识了一位原 8341 部队驻北大军宣队的成员，他 1969 年 20 岁时进入北大，文革后留在北大，进修获得大专文凭，还评上了副高职称，当了图书馆副馆长。他向我简述了自己的经历，并给我几本书，包括：卢鸿盛（8341 部队某大队政委，原北大江西鲤鱼洲分校党委书记）著《从未名湖到鲤鱼洲-1969 年 3 月至 1972 年 5 月在北大支左的回忆与感念》、郭宗林（4587 部队即 63 军干部、原北大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著《未名湖畔的记忆-北京大学支左始末》、王丽丽（原 8341 部队副政委、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连龙的女儿）编《守卫忠诚——缅怀王连龙同志》以及一本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原系主任）主编的《鲤鱼洲纪事》，其中有卢鸿盛的许多批注。我仔细阅读了这几本书和卢鸿盛的批注，感到这些对研究北大文革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补充和丰富了北大文革历史研究的内容，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客观真实地认识和了解了北大文革的历史真相。

下面根据上述资料将几位军宣队成员对北大文革的看法概括地介绍一下：

一、对北大文革阶段的划分

卢鸿盛在《从未名湖到鲤鱼洲》一书中写道：

据我所知，北大的文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份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至1968年7月份。这一阶段聂元梓及校文革掌权，聂元梓红得发紫，一手遮天。教授、干部受到很大冲击，多人自杀身亡死于非命，后又发展到两派武斗，有些青年学生在武斗中受伤致残或被打死。

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份。这一阶段在4587部队领导下，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指示，实现两派联合。在此阶段，宣传队领导明显偏袒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并在“清队”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又造成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的自杀身亡，引起毛泽东的震惊。

第三阶段是自1969年3月下旬开始。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得知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后又震惊又悲恻，先派谢静宜到北大调研、了解情况，随后于3月24日派杨德中率8341部队86人进驻北大掺沙子（原部队仍留驻，但主导权归8341部队），纠正原宣传队的错误，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批判聂元梓的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两派真正联合。自8341部队进驻北大后，由于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很快实现了两派大联合，取消了“劳改大院”，

纠正了上百起冤假错案，很多教员和干部得到了解放，一些原校、系领导陆续回到领导岗位，恢复党团生活。使整个北大由乱而治。这为以后重新招生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纵观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最坏，教员、干部受到很大冲击，自杀、逼供信致死者多人。第二阶段政策执行的不好，又在“清队”等运动中死亡20多人。第三阶段能认真纠正以前错误，死人情况很少，在此期间共有2人非正常死亡。

原8341部队战士、北大军宣队成员、文革后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的武振江在《守卫忠诚—缅怀王连龙同志》书中的“连龙印象”一文也沿用了卢鸿盛的说法。

而大多数北大师生和文革史研究者在划分北大文革阶段时是将张承先工作组时期（1966年6月2日-7月26日）作为第一阶段，聂元梓校文革时期（1966年7月28日-1968年8月18日）作为第二阶段，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时期（1968年8月19日-1976年10月）作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又可分为前期（4587部队主导）和后期（8341部队主导）。卢鸿盛是1969年3月进驻北大的，对工作组时期不了解，把工作组时期和聂元梓校文革时期合并成一个阶段，是不确切的。

二、对校文革和聂元梓的评价

郭宗林在《未名湖畔的记忆》一书中写道：

在文化革命中，北京大学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教师孙蓬一为首的公社派，一派是井冈山派。聂元梓这个人其实很值得研究。她1921年出生，在哥哥聂真的影响下，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当过哈尔滨区委宣传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长，1953年定级就是行政12级，是高干。1963年她调到北大经济系任副主任，1964年担任了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孙蓬一的党龄也不短。

聂元梓等几个人在1966年5月5日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

干了些什末》的大字报。毛主席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8月17日还亲自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人民日报为此在24日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聂元梓就出了名，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校内，则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校文革。聂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特别狂妄，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得“牛棚”满校园，还私设公堂，对反对派残酷镇压，甚至往人腿上钉钉子，很变态。聂元梓常说她的校文革是红色政权，到处说毛主席也支持她。（26-27页）

11月21日（注：1968年），为帮助聂元梓，宣传队组织了600人的会议，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严肃的批评。鉴于她的问题，宣传队在11月12日就给市委写了“关于聂元梓不能参加市委代表会的报告”，但未获批准。据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揭发说聂元梓当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总嫌自己的权小，经常散布说还不如民主人士呢。由于对聂元梓的派性批斗不够，他们一派的气焰没有被彻底打下去，对不是自己一派的人，还在实行残酷斗争。（13-14页）

王连龙在讲话中，用事实批评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极左行为，这使得聂元梓一派非常不满，孙蓬一等人当场就想闹事，死抓住一些问题不放，说他们校文革是红色政权，拿着小本子念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领导的话……，强烈叫嚣对王连龙代表宣传队所作的表态不服气。

8341部队用简报把大会的情况和聂元梓一派的反应反映给了毛主席，主席看过简报很生气，当即挥手说：小谢，你拿笔记，用你的话回去传达。毛主席这时站了起来，愤怒地说：“你老佛爷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的手都伸到汉中、伸到石家庄、伸到华北局了，不知道羞耻！你拿小本子压群众，念谁谁支持你，我支持你正确的，不支持你错误的。我叫你文斗，你搞武斗。你戴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你自称是红色政权，你是武斗文革、你是逼供信文革，派性文革。你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斗是斗，搞武斗，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说你们听我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搞大联合，你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

谢静宜将毛主席的话整理后，在北大东操场召开了全校大会，在会上，谢静宜宣讲的是毛主席的原话，这一下子，产生的震动非常大，听者反应强烈，有人感叹，谢静宜讲话这么硬，真是厉害。这次讲话，当头把聂元梓一派的气焰打下去了。许多人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23-25 页）

1970 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宣传队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北京市委的部署，在北大建立了清查“516”小组，展开了清查“516”的活动。这一次，对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516”罪行，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

开始，聂元梓等人的态度极不老实，抗拒交代问题，还销毁罪证。聂元梓将罪行录音磁带私自毁掉，塞进自家厕所的马桶里。结果马桶堵住下水道不通了，厕所不能使用，没办法只好叫修理工人去修厕所。工人从厕所马桶下水道中掏出的都是录音磁带。她没有销毁罪行证据反倒成为她态度不老实的证明，弄巧成拙了。清查小组就利用这件事，批态度、讲政策，让她主动清，不要被动清。结果她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交代一点，总算有些好转。（56-57 页）

为了摧垮“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有计划、有预谋地于3月28日晚到29日一点半突然袭击了31楼，许多井冈山的同学被打伤，加上不少同学怕挨打，从二、三楼窗户跳下去，摔伤者共有100余人。这次武斗惊动了北京市委负责人和卫戍区领导来现场勘察，定为“3.29”事件。（64 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多次去北大，对聂元梓表示了支持，康生也支持她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时期，她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的话百依百顺，积极参加江青、陈伯达策划的围困中南海行动，并参加江青鼓励的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誓师大会。她说：“要听中央文革的话，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我们要听戚本禹的。”后来江青、康生批评她说：你有野心，想当大人物，想往上爬，反对谢富治，不听中央文革的话，骄傲自满，吃老本等。这些话讲到了她的痛处，就开始反江青、康生，对抗起中央文革来了。现在有人反过来说她当时反江青、反对文革，基本上是断章取义，或者是根

本不了解这些情况。（65页）

应该说，郭宗林对聂元梓、孙蓬一的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当然有些是按照毛泽东对谢静宜的讲话定的调子。关于北大武斗的发动时间和责任者，郭宗林的表述也是正确的。但他对清查“516”的看法，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的认识水平，没有从今天的认识上对这场运动给予彻底否定。聂元梓、孙蓬一虽然罪行累累，但把他们说成是“516”分子也是不确切的。此外，聂元梓在文革中并没有敢于公开反对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只是借着反潘梓年、吴传启表示对关锋不满，孙蓬一倒是在1967年4月12日讲话中表达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新北大公社部分人贴出了反对谢富治的大标语，被聂元梓派人覆盖了，后来孙蓬一也就此做了检讨。

三、对鲤鱼洲分校的认识

文革后期，许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在办“五七”干校。8341部队进入清华、北大后，也开始考虑办干校。1969年4月30日，清华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宣布清华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办实验农场，号召全校干部教师积极参加，随后，首批398人先期到达。1969年7月10日北大先遣队23人赴鲤鱼洲筹建农场，10月10日，北大宣传队指挥部决定8341部队的卢鸿盛和4587部队的田双喜为江西试验农场负责人，带领500多人乘火车离京，奔赴鲤鱼洲。之后，两校陆续分批前往鲤鱼洲的人数达到数千人。由于那里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还有血吸虫病流行，许多干部、教师在那里遭受了痛苦的折磨，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1971年8月，两校撤销江西分校，人员全部回到北京。

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时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主编的《鲤鱼洲纪事》，其中有中文系20多名教师写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他们在鲤鱼洲的经历，也对当时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做了控诉。

卢鸿盛看到了这本书，有自己一些不同的看法，写在了《从未名湖到鲤鱼洲》里，还对《鲤鱼洲纪事》一书做了许多批注。他的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鲤鱼洲的选址上：

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一书的前言中引用某位教师的口述：“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地点是九江边上的一所农场，有关同志看过后认为，农场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农场，整天雾气腾腾，有关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有水果吃，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还有人说：最后选在鲤鱼洲，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血吸虫病，有利于对知识分子改造。我看了后心情很不平静，觉得这简直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千校选址清华早于北大。大概于1969年3、4月份，他们把千校选址问题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是江西人、老红军，对江西省很熟悉，他立即想到江西，请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协助解决五七千校用地问题。当时汪东兴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他让秘书通知杨德中、张荣温、迟群、谢静宜、王连龙到北京医院会客厅。人到之后，汪东兴让程世清派来的江西的两位同志铺开地图介绍清华北大办千校的地址意向。他们指着地图说，清华北大办千校就在南昌鄱阳湖边，叫鲤鱼洲的地方。到会同志问，那地方有没有血吸虫？他们说绝对没有血吸虫。清华党委听了江西来人介绍后，为了慎重起见，又派清华军代表、8341部队四大队大队长徐敬启同志带几个人到鲤鱼洲调查。陪同的是来京汇报的那两个人，他们陪徐敬启等同志到鲤鱼洲建设兵团九团会议室，那两位同志照样指着地图说，清华在中段，北大在南段，两校分界线都划定了，清华5500余亩，北大4000余亩。徐听了介绍没有到当地调查，坐上车在大堤上转一圈，完全轻信了他们的介绍。回来向清华党委汇报说那个地方很好，办农场没有问题。清华派人打前站去做准备工作。1969年4月30日，清华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宣布清华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办实验农场，号召全校干部教师积极参加，还是徐敬启带队，首批398人先期到达。由于没有认真调查造成严重后果。虽然晚于半年去千校，但是北大千校的选址是与清华一起提前确定的，而且只此一处，是上

边的决定。

卢鸿盛和部分北大教师关于干校选址的分歧在于：北大部分教师认为选址时就知道鲤鱼洲有血吸虫，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还选择这个地方；而卢鸿盛认为是由于选址人没有认真调查造成的。但鲤鱼洲的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卢鸿盛和北大教师的在各自的书中叙述都是一致的。

1. 关于从鲤鱼洲撤回北京

关于清华、北大撤出鲤鱼洲回到北京，两校都有一些传说，有的说是有人写信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了情况后决定撤回的，有的说是林彪“913事件”影响的。而卢鸿盛和郭宗林书中的记述与此不同，他们都说是谢静宜到鲤鱼洲考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决定撤回的，小谢起了关键作用。卢鸿盛书中写道：

1971年5、6月，谢静宜先后两次到清华试验农场和北大分校调查，我当时向谢汇报了分校的工作和大家的情况，特别是人员中查出大量血吸虫病后，人心还基本不乱，各项工作还照常进行，但有五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很难解决：

（1）北大江西分校地段属血吸虫中等疫区，查了1500人左右，被感染的人占总人数48%，在21名军宣队员中，也已经有9人染上了血吸虫。如果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由于雨水和湖水的浸泡，鲤鱼洲大堤高度从28米降到26米，堤宽从8米缩到6米，如果不及时修理，遇到大洪水，大堤决口怎么办？

（3）教师、干部和员工长期住在草棚，地潮湿对身体健康不利，如盖砖房投资很大，不好解决。学生上课连教室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图书资料，这样学校怎么能长期办下去？

（4）交通问题很严峻，对外联系极不方便。如要彻底改善交通，必须要修桥修水泥路，需要大量资金，哪里出？

(5) 饮水困难，湖里的水不能直接饮用，各连打井出来的水，不到半小时就会变成一滩黄水，只有加石灰沉淀后才能用，长期饮用这样的水，对人的身体肯定有害。

谢静宜听了不断点头，其实她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血吸虫病蔓延的问题。她在分校呆了3天，虽然不露声色，但从她的直言片语中我们就感到要撤回。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她让当时正在搞的一个建房工程停工。她回到北京后，当即把自己了解血吸虫病的情况报告给杨德中、汪东兴，并提出两校师生从鲤鱼洲撤回北京。随后她直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谢静宜的汇报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是要用的，还是要保护的。既然那里有血吸虫病就撤回来吧！撤回来后可以在北京郊区办干校，你去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解决。北大党委1971年8月6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王连龙书记传达了关于将江西鲤鱼洲试验农场转移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天堂河）的决定。分校随即撤回。第一批人员8月4日到京。所以我说北大江西分校从鲤鱼洲撤回的关键人物是谢静宜。（《从未名湖到鲤鱼洲》29-31页）

郭宗林在书中的记述和卢鸿盛基本相同（《未名湖畔的记忆》72-74页）。此外谢静宜本人在她的遗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第二部分专门有一节“毛主席决定清华、北大在江西的农场搬回北京”，其中的内容与卢、郭二人的记述也基本相同（该书204-206页）。由此可见，他们的记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2. 关于军宣队在鲤鱼洲的作用

在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中，一些文章的作者对当时的遭遇和对军宣队难免有一些怨恨之词。但卢鸿盛对军宣队在鲤鱼洲的工作则基本上是肯定的。他在书中记述了军宣队为改进基础设施，改善生活条件，做了如下一些事：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砖瓦房，建成一批后就划拨一些作为家属房，让全家来鲤

鱼洲的夫妇轮流住，后来家属房建多了，有些夫妇就可以长期住家属房了。另外还建几所砖瓦大仓库，已备秋后储粮。

(2) 修公共厕所。

(3) 修澡堂让大家能洗澡。

(4) 成立缝纫组，解决做、补衣服的问题。

(5) 自己种菜、养猪、养奶牛、养鸡鸭、捕鱼，改善生活，改进副食。

(6) 建幼儿园。

(7) 开办中小学，解决带去的子女上学问题。

(8) 自制冷饮，防止中暑。

(9) 建小卖部。

(10) 建立医务室，解决小伤小病的医疗问题。

(11) 建广播站，放电影。

(12) 建气象站，预报天气。

(13) 解决部分教员、干部夫妇长期分居的问题。

另外在他的笔下，军宣队成员和教师、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北大部分教师和军宣队成员对鲤鱼洲生活的记述有所不同，也是正常的现象，教师们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对鲤鱼洲的生活否定多于肯定，军宣队成员则是领导者，对自己的工作肯定多于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对王连龙的评价

王连龙生于1921年，晋东南黎城县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入党，调入中央警卫团，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1945年任连指导员，参加保卫延安战斗，解放战争期间转移至平山县西柏坡担任保卫工作，1949年进京，历任任公安总队教导员、干部队政委、中

央警卫团（8341 部队）副政委。1969 年 3 月作为军宣队成员进驻北京大学，历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离开北大回部队。2015 年去世，享年 94 岁。

关于王连龙在北大工作期间的表现，北大师生和军宣队成员也有不同的评价。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到北大后，周培源先生直截了当地批评王连龙等人执行了极左路线，王连龙等人被停止工作，进入学习班，校园里也贴了很多批判党委的大字报。1977 年 11 月 10 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四人（北大党委中军宣队成员）被“押到现场”，接受批判。在当时北大师生眼里，王连龙是四人帮在北大的代表。

但在卢鸿盛、郭宗林和王丽丽编写的书中，对王连龙在北大的工作是给予肯定的，对他的人品、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是给予了很多赞扬。卢鸿盛在书中写道：

连龙同志在北大工作近八年，在北大人心目中他不愧为一个好领导。他对党忠诚，全心全意倾注于工作之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北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北大人的敬仰和爱戴。2015 年 3 月连龙同志去世，北大的一批干部、教师自发去医院挥泪为连龙同志送行。原北大马列所所长徐雅民教授还写了缅怀连龙同志的文章，徐教授曾是北大校党委常委，与连龙同志在工作上联系较多，他以生动的事例为依据，对连龙同志的工作、作风和人品做了公正的描述。《从未名湖到鲤鱼洲》第 50 页）。

郭宗林回忆道：“在与连龙接触的这些年，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至今难以忘怀。看到今日之社会现象，让我更是想起连龙同志的许多往事，这些事到今天还依然感动着我，他一心为公，全心扑在工作上，默默无私地奉献，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心里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1972 年连龙同志因操劳过度患上了冠心病，可是他看到大量的工作不能等，就硬是没有去住院。同年，他的老父亲在老家病危，弥留之际想见见唯一的儿子，但是为了工作

他还是没有回去，老父去世后他也没有回家奔丧处理后事。”

“1973年，他爱人得了肺结核，需要做切除肺叶的手术，手术前他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没能签字，是年仅17岁的儿子代爸爸签的字，手术后他才抽了个空去看望了爱人。”

“长期的革命生涯养成了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讲：正人先正己，总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处处以身作则。在北大支左期间，出门用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公私分明。虽然家在市里，但他平时住在学校，遇到节假日他回家时，北大车队派车送他，他不用。经常自己掏钱坐公共汽车回家。车队司机师傅说：您回家坐学校的车是应该的，何必要坐公共汽车？他说：小车是为办公用的，我回家是私事，不应该坐公家的车。车队张师傅说：王书记人好，保持了的作风，艰苦朴素，公私分明，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后来北大的书记、副书记、常委好几个人都是住在城里，平时住在学校，节假日才回家，连龙同志就建议为了节约，几个人坐一辆车进城，分别回家。”

“原北大党常委田双喜（原63军副参谋长）离开北大要回部队工作时，连龙同志为了给田双喜送行，自己拿出40元钱，让伙房多做几个菜给田副参谋长送行。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同志来北大的时候，连龙同志也是用自己的工资请万里同志吃中午饭，一视同仁，绝不溜须怕马。”

“文革中有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1970年北大率先在全国招生后，想上大学的人很多。许多单位和个人请连龙同志行个方便，当时只要他说个话收个学生并不难。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不能破坏学校的规矩，上学要走基层推荐，单位批准，学校复审的步骤。虽然自己是北大的第一把手，但是如果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言行，那怎么能带好队伍呢？他最疼爱的女儿丽丽也来信来电话请爸爸帮助自己上大学，但他硬是顶住了亲情。就这样，他没有私自介绍过一个学生来北大上学。”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连龙同志带领机关有关人员检查情况，记得有一天，下着大雨，连龙挽着裤腿，打着手电在雨中一家一户检查防震棚有无漏雨，还去燕南园看老教授们住的防震棚怎样。地震后，连龙同志都不知道自己家的防震棚盖在了什么地

方，半个月后才知道自己家搬到了中山公园里。我催他赶紧回家看看，他总是没有时间。我只好硬拉着他回去看了一次。看到连龙回家，他老伴赶紧跑到家里做了他爱吃的热汤面，端来让他吃。他却说：学校事多，我回来看看你们，你们安全我就放心了，我还是要马上赶回学校。结果饭也没吃，起身就走。连龙同志的爱人眼里含着泪抱怨说：就连吃点饭的时间都没有吗？她看着我们走出了地防震棚。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守卫忠诚—缅怀王连龙同志》第57-68页）

许多北大的老教师、干部对王连龙也有很好的印象。在王连龙80岁和92岁生日的时候，部分北大老同志为他举办了祝寿宴会，许多原北大的领导同志和教师包括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副校长何芳川、林钧敬等分别在宴会上发表讲话，原副校长（现党委书记）郝平到家中看望。在王连龙去世后，还有一些北大老教师写了文章和诗表示怀念。可见无论是部队的还是北大的老同志，对王连龙的人品和作风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在那个年代，王连龙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十分难得的。

五、对军宣队自身的评价

军宣队的成员对自己在北大工作期间的工作基本上是给予肯定的。卢鸿盛说：

《北大图史》一书，不分青红皂白，将文革前两阶段死亡多人的严重罪错都归结到8341部队身上是一种误解、误导，实际情况是8341部队就是为了纠正前面的错误而来的。这是当时北大在校教职工有目共睹的事情。

当然，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8341部队在其主导北大工作的过程中，亦不可能躲开“左”的路线影响，路线是自上而下贯彻的问题，执行者是无法躲避的。但是作为军宣队员其实也是受害者，按当时的要求，参加军宣队的同志都是表现比较好的，主要

是干部，也有少数战士，这些同志是准备锻炼后回部队提拔重用的，可是他们在北大“锻炼”的结果却非常悲惨。

一是军宣队员所处条件艰苦，工作生活不稳定，待遇大打折扣。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在部队生活是正常的，工作是稳定的。在部队大家住在营房，吃在食堂，部队生活有补贴，连队都有副食生产基地，伙食很好。到军宣队后一切补贴都没有了，自己在食堂买饭吃。有的同志只吃素菜，甚至只吃咸菜就米饭，生活待遇大打折扣。而且在部队都有正常的升迁机会，可是到了军宣队慢慢被部队干部部门遗忘了，别说升迁，其级别待遇也是多年不变。

二是表现越好，能力越强，在北大呆的时间越长的同志越倒霉。开始来北大的86人，随着北大大批干部被解放，校级、系级和机关的主要岗位逐渐由地方干部担任，军队干部逐渐归队。在这个过程中，回去较早的同志都由部队安排的工作，而回去较晚的同志都安排转业。原来所谓的锻炼提拔化为乌有。到最后，剩下十几个人，当时部队表示已无岗位，又赶上百万大裁军，就把剩下的十几个基层干部中的6人，应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要求，经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准转业留在了北大。据说他们在打倒四人帮后处境凄惨。他们在北大贯彻的是毛的路线，执行的是上级（中办、中央警卫局）的政策，可是文革后，连龙和这些留在北大的军宣队员挨整受审查，受委屈。而当年派他们来的人，制定政策并掌控北大多年（除毛之外）的最高领导人，却把他们原来掌控北大事做的事情全部推给了执行他们政策的下级。真是连龙这样的好人也受委屈。

三是随我去鲤鱼洲的同志亦是受苦受难，身心都受到很大伤害。当时随我去鲤鱼洲的同志有军宣队员、工宣队员一共十人。那里的环境比学校差。但是要求军工宣队员要深入基层，与五七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像吉常宏先生（中文系教师）说的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完全是同志关系，同甘共苦。以我为例，当时很多人都住进了砖瓦房，我和分校指挥部还一直守在茅草屋里，天天与大家一起吃食堂，晚上加班到很晚时就用饭盒煮点挂面。工作没有时间概念，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与我同去的军宣队员很多同志也感染了血

吸虫病，以德安化肥厂为例，三名军宣队员都得了血吸虫病，感染率 100%，其中 8341 部队的倪锡山同志（江西分校领导小组成员、德安县化肥厂厂长）感染了血吸虫病，回部队后身体一直不好，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据说北大职工在江西分校得过血吸虫病的同志后来得到学校的关照和较好的治疗。而我们部队的同志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治疗和疗养。

（《从未名湖到鲤鱼洲》，37-39 页）

武振江的看法和卢鸿盛基本相同，他认为“王连龙同志是北大文革中后期的领导者，同时他和军宣队同志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守卫忠诚-缅怀王连龙同志》，88 页）。

郭宗林回忆说：

1977 年 11 月 10 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后，新来的北大党委负责人周林宣布《对王某某等人的处理决定》，说其把北大党委变成了帮派党委，并把北京大学变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阵地。专案组让我谈谈有什么感想，我说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大快人心，无疑是正确的，我发自内心地拥护。但对我个人是强加的罪，是不实之词，我没有把北京大学变成篡党夺权的阵地，对我的处理我不服，这是北大党委的耻辱，我要向北京市委写信反映，他们说你想写就写吧！我当然就向北京市委写了封信，请北大党委转上去。几年中，我又多次申诉，据实力争。终于，在北京市委调查后给我做出的那份最终结论里，原来的“帮派党委”、“把北京大学变成篡党夺权的阵地”一类的话就没有再出现了。

许多人在写回忆录时喜隐恶扬善，军宣队成员在评价自己在北大文革中的工作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出一种委屈心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北京大学文革的亲历者的研究者，笔者认为对 8341 在北大文革中的表现应一分为二，一方面他们来北大后确实对前期军宣队的极左做法进行了纠偏，解放了许多干部、教师和学生，在后期的日常工作中也

做出了很多贡献，像王连龙这样的干部其工作作风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依旧执行了当时左的路线和政策，继续打击迫害了部分群众，例如在毕业分配时扣留了陈醒迈、齐菊生、程汉良、刘立民、王远枝、何维凌、胡定国等同学，把他们打成“反动集团”或“反动学生”，强迫劳动，而对最后三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采取了极不人性的做法，统统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使他们荒费了近10年的大好时光，还造成了不少新的悲剧（如被野兽吞噬、致残、过早病故等）。在清理“516”集团、批林批孔、组织“梁效”写作班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行动中，他们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然，作为军宣队的成员，他们不过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一种工具，在使用过后就被抛弃，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总的来说，军宣队成员们的回忆，补充了北大文革的内容，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到更加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评论】

朱成昭：文革史应该记载的一个重要名字

王复兴

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期造反派红卫兵的著名领袖。

朱成昭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运动，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闭门思过”，从而退出了运动，退出了对地院“东方红”的领导，而后由王大宾担任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头、与

朱过从甚密。)南下广州游玩时,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在广州抓获,并带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叶被公安部正式拘留,朱、叶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朱成昭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做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而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下令释放,先去解放军301医院学医,成为军医。后又重回戏剧界,曾以“凌子”的艺名导演电影《原野》,声名远扬。她于1972年被释放后,便对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与朱往来。而朱在长达十几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情信、情诗。这大概是一位高干女儿、贵族“千金”与一位普通干部子弟之间,因门不当、户不对,在红色中国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悲剧之一。

朱成昭于1980年6月获正式平反。当时中组部准备在全国树两个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一个是死去的张志新,再一个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朱这个典型因叶剑英的反对而被勾掉。理由是树活着的典型不好。人们心里清楚:朱、叶二人在文革初期的关系;叶向真以及其父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对当局而言,是应尽量淡化,少曝光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经历,择要摘引自宋永毅:《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于2003年《华夏文摘增刊》ZK0312b。)

下面,让我们回顾:朱成昭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为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又怎样从一个造反派变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组,争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朱成昭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的高中,在学校是团干部。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调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并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后于1962年考上

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以“调干生”名义入校。入校后曾和许多同学一起两次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朱是地院四年级学生。由于以上经历，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阅历丰富一些，本人长于独立思考，想问题较深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文革运动，派了大批工作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学。6月8日，国务院地质部派出以副部长鄒家尤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取代了地院党委，领导地院文革。工作队是按中共中央刘、邓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为指导思想来领导运动的。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238页）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刊于《华夏文摘增刊》2012年7月10日第855期）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已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

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 1957 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 1957 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地院工作队进校后，首先抛出了地院党委书记高元贵，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全校进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师生认为高书记是好干部。同时，工作队矛头向下，批斗了许多一般干部、教师。工作队的作法，引起许多干部、教师、学生的不满。

6 月 20 日，地院在校园内爆发了反工作队的游行。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学生带领下，到了工作队的办公楼下，要和鄒家尤辩论，后被保工作队的群众和工人解了围。

6 月 22 日，副总理薄一波针对“6.20 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其意反工作队即反党。

6 月 23 日，由原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牵头、有王大宾等 47 名师生签名的“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醜、大暴露！》”贴出，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工作队的围剿、打击。参与这张大字报的干部、教师、学生成了各系、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并被工作队内定为右派。

6 月 25 日下午，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放薄一波的批示，围剿反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工作队关闭了学校两个大门，没有工作队放行条任何人不能自行离校，限制师生的行动自由。凡参加了 6.20 游行和贴了反工作组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个挨批，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等待处理。李贵、王大来等十三名干部被拉到全院大会批斗。王大宾在探工系成了批斗重点。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 月 25 日、26 日两天，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场举行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会由江青主持。江青、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支持了批评张承先工作组的师生，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消息很快（26 日晚）就传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宾、蔡新平、周永璋、伏庆是、殷维候、杜金山、莊一龙七人翻越学校西面围墙，逃离地院，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七人见到聂元梓。聂介绍了北大25、26日大会情况，表示支持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行动。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写个大字报，由殷维候执笔，题目是《走访北大的声明》，七人签名后贴到北五楼底大门外墙上，马上引起轰动，观者云集。大字报透露，从聂元梓那里得到信息，95%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队打压的师生受到极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代表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队队长鄒家尤向地院师生作了一个小时检查后，带领200多人的工作队撤离了地院。鄒在检查中，并没有否定工作队的方向与路线，也没有肯定师生对工作队的批评，没作任何道歉。工作队撤走前，组成了以保工作队的师生为骨干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组建了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工作队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队两派师生的对立与争论。

工作队撤走前夕，水文系学生朱成昭，带领51621班郑文卿等同学，组成了地院第一个造反派战斗队“爆破战斗队”，张贴大标语，要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打击一大片的社会主义路线，提出不能让鄒家尤、工作队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见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师生代表开会，组建了全校性的“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为总勤务员、一把手，核心组有王大宾。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时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对工作队提了些意见，结果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学生”（有问题的右派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内定将来要“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一位副队长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观点一致的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大队”。紧跟着于8月17日进一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有上千人，核心组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璋、

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王大宾为二把手。“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笔者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们炮轰走资派的大标语。很快，地院“东方红”的名号传遍全市、全国，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影响很大。由于“东方红”反对中学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很快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东方红”牵头，串联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个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与保守派为主的一司、二司相对立，成为全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据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说，“首都三司”从未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是实际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受压，周恩来、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东方红”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造反派队伍。朱后来又请蒯大富担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领头作用，威名赫赫，在群众中有极高声望。

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1966年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上千人一进地质部，游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门内地质部大楼，开进大院静坐示威。行动总指挥是朱成昭，副总指挥蒋良朴、杨雨中。静坐二小时，要求地质部领导：令工作队队长鄒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检查；工作队向地院师生道歉；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突然发生由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闯入地质部大院，对地院师生声讨、谩骂，高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由于地院师生的克制，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至24日凌晨四点左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笏到地质部，传达中央指示：

1. 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 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 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8月24日，地院“东方红”撤回了地院，当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东方红”与保工作组的“斗批改兵团”展开辩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工作队队长鄒家尤到会，听取意见。“东方红”贾振远、蔡新平等上台发言，激烈批评工作队压制、打击群众，开展反干扰、抓游鱼的方向、路钱错误。“东方红”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在中央文革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陶鲁茄表态支持了“东方红”。大会后，保守派“斗批改兵团”一蹶不振，日渐势微，名存实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东方红”上千名群众，二进地质部静坐。总指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协助。“东方红”要求：地质部交出鄒家尤，回地院接受群众揭、批、斗；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晚上九时，“西纠”的头头孔丹带领“老兵”，再次赶到大院进行压制。“西纠”用地质部广播台攻击“东方红”，用纠察队把“东方红”包围在楼下院内，限制行动。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西纠”司令孔丹母亲、时任国务院秘书）第二天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撤退，“西纠”这才撤走。

地院“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当年很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当年“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称其为“保皇派”）矛盾背后的社会意义。“西纠”司令孔丹在“东方红进驻地质部事件”47年之后，在其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对此事件回忆说：“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孔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王大宾回忆说，那天薄熙来也参加了“西纠”的行动。

事过49年之后，在《王大宾回忆录》第35页，王大宾对此事件评论道：

孔丹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我们这些平

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是的，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人，对被“老干部”仅因其对工作队持批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应是完全不同类的人，他们始终是无法理解、同情我们这些“右派”的处境的，还竟敢起来向“老干部”争取自己的人权，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不行的。王大宾以上评论很精彩。他点出了当年造反派争的是什么？是：人权！“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具有反抗专治统治的性质。而“西纠”当年出于保爹保妈的垄断利益，打压造反派确是权贵子弟的天然反应。

二进地质部坚持了十三天，而后“东方红”核心组听取了肖力的意见，于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当时常去地院调查并支持“东方红”。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又三进、四进地质部，揭批何长工、鄒家尤执行的资反路线。

此处笔者对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从1966年7月反工作组至当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刘邓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于66年8月兴起的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他们扫四旧，进而搞恐怖的红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类”，后来发展成“联动”，他们从来不自诩为“造反派”，反而被群众称为“保皇派”。1968年8月开始进驻大专院校的工宣队，更不是什么造反派，工人们自认为是“领导阶级”，他们反而在“肃清516分子”的运动中是镇压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于1967年2月以后分裂，分裂成新的两大派，大打内战，争权夺利，争占山头，武斗，此时的造反派已经变质，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内斗派”、“山头宗派”、充满“派性”的“武斗派”。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们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乱。笔者记得，在2016年6月于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清华教授秦晖就曾即席发言，认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晖的意见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与“反”资反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该统统取消。”“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发表国庆讲话，号召批判“反对革命的反动路线”。

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路线的批判，上纲越来越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使路线斗争大大升温、升级。十三期社论后，全国掀起了批资反路线的高潮。

10月6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蒯大富宣读了大会的誓词。

10月中，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二人检查的传单传遍全国。当时笔者在重庆，看到了二人检查的记录传单。陈伯达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在讲话中，尖锐批判了老兵的“血统论”对联，指出它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世袭论。这个讲话影响很大，笔者与北大“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几个同学当时在重庆大学串联，看到讲话的传单后，马上借钢版刻印、油印，四处散发。

11月初，笔者所在的北大“红旗兵团”的“红梅战斗队”回到北大，11月中时，“红梅”队长徐森被“红旗兵团”任命为动态组组长。徐森当时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东

方红”参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串联会，讨论形势。徐森回校后向战斗队传达了朱成昭的发言。朱分析形势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发展，中间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拢；左派（造反派）迅速壮大，由少数变为多数；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数变为少数。左派应乘胜前进，彻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势，确如朱成昭所分析。

从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学生反工作，自发成立“东方红公社”，串联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资反路线。可以看出，当年的造反派具有鲜明的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的倾向。他们的造反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党的运动，如“土改”、“反右”、“四清”等党的运动。文革的造反运动是体制外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反应了这种情况。朱成昭等学生成立的“东方红”、“首都三司”，有明显的实践“结社自由”的倾向。他们批工作组，四进地质部静坐，更具有明显的争取“言论自由”、争取“监督权力”的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销毁黑材料”的斗争，更是体现了反迫害、要人权的公民运动的特点

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从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料”为重点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6、7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从10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工作组在50多天里，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文革后期大规模反右，划右派，许多工作队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各省市、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群众普遍称其

为整人用的“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也害怕塞进档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辈子，因而坚决要求销毁。十七年来，用履历、出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案、“黑材料”来控制人，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已深恶痛绝。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也可以当众销毁。”笔者记得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地张贴，无论笔者走到那里，包括在外地大串联，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销毁整人的黑材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讨、销毁“黑材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市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政府机关办公室，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12月在杭州，由于浙江省委把工作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联合行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地院、清华、北外、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销毁“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10月22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院的群众代表说，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指示尽快销毁。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群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1966年年底。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性斗争，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许多地方贴这个标语，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6、7月反工作组开始），10月5日公布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后，在10、11、12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于得到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人权运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治，争自由，争人权。笔者认为这一反迫害的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人民群众在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萌芽。而群众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与毛泽东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打倒政敌的战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对人民而言，这是难得历史机遇，或曰“机会”，朱成昭等地院同学抓住了机会，发起争取自身权力的公民运动，走到了时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销毁了，不等于就没办法“秋后标帐”了。过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很多帐就开始清标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没有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极左思潮影响犯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300多万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许多人自杀。仅四川在1970年前8个月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有3887起自杀，死亡3331人。（据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国禁闻网》）地院的清查，自杀的就有李思田、李明哲、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李贵老师跳楼摔断了腿（据《王大宾回忆录》178页）。地院清查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五一六！516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中头号的第一大冤案。（以上追查“黑材料”群众运动的资料，择要摘引自王复兴：《抢救记忆》第四章第5节）

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朱成昭按照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朱成昭前后派了第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线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王大来等人与彭进行了长谈。彭坦诚地谈了大跃进中的问题，谈了自己在庐山上所提意见。结果王大来等人被彭感化，对彭产生了同情，认为彭案是冤案，不应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败。

于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宾等去成都揪彭。王大宾12月18日到成都，见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来等人，听了王大来详细汇报与彭的谈话，而后王大宾也与彭进行了长谈。结果王大宾完全认同了王大来的看法，认为不应揪彭，应向中央反映意见。于是王大来马上回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此时也开始同情彭，派杨雨中去中央文革汇报意见，并上交给中央文草地院学生与彭交谈的长篇记录稿。企图说服中央文革，结果遭到戚本禹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立刻换马，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揪彭回京。

这时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乐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时北航红旗已从三线指挥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众又抢回了彭德怀，双方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两派武斗。（天、地派也并不是由此而分裂。其实，王大宾、韩爱晶虽一个是地，一个在天，但都否认有天、地两派。揪彭事件也并没造成两家分裂。）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与成都军区共同乘34次列车火车护送彭帅抵京。在西直门火车站，朱成昭拒绝执行戚本禹所传达的周总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坚持要把彭带回地质学院。谁也拧不过他。（朱显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来、王大宾的意见弄明白，又或许想与彭帅详谈，深入了解彭案是非。）

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点。朱还没来得及与彭聊天，凌晨三点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地院传达周恩来指示，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彭被卫戍区带走。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怀随身携带一小箱机密材料，内有他的庐

山“意见书”、有他后来写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朱成昭详细阅读了彭的资料，还让人全部抄写了一套，在“东方红”核心圈内传阅。几天后，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对王大宾讲：“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与地院在北航大操场，举行了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以北航为主，在北航召开，地院很低调。实际上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等人对斗彭很抵触，但不得不应付。此时朱成昭已离开核心组，脱离了运动。

当时像朱成昭、王大宾这样看待彭德怀的，在地院“东方红”不是一、二个人，而是有一批师生，如：王大来、钱新、陈保堂、杨文远、郑文卿等等。他们与彭帅接触、交谈后，根据自己在1958、1959年的亲身经历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诉书”，认为彭在庐山讲得是实话，是正确的，把彭打成反党分子是冤案。这便说明了几个问题：

1. “造反派”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乌和之众”，他们并不盲从，而长于独立思考。
2. 他们并不“唯上”，而较“唯实”，对“非实”事物，敢于大胆怀疑并反对。

3. 文革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毛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毛的这个说词早在文革初期就传开了。朱成昭等人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揪彭、批彭是错的，这便势必发展到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质疑。

4. 地院“东方红”前后两次反对从成都揪彭回京，顶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评：“立场动摇”，“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朱成昭们心里不服，于是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反对。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紧跟着于1967年1月开始，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两件事在时间上紧紧相扣，这绝非偶然。

5. 地院“东方红”揪彭的经过是对“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论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会对揪彭两次抗命。地院“东方红”当初反工作组，也并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压迫而造反。内在的动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东方红”成都三次揪彭史

料，择要摘引自《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5 年）

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1967 年元旦刚过，朱成昭召开了一个分析文革形势的内部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黑会”。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运动的想法。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悠。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没有不透风的墙，1 月 20 日左右，朱成昭在“东方红”内部会议的讲话被传了出去。“丛中笑”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有攻击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这张大字报很快引起“东方红”内部一些人对朱的声讨，“东方红”内部乱了起来。同时，有人向中央文革递交了材料，报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论。

1967 年 1 月 24 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陈伯达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王广宇向朱成昭单个人唸了这封短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变成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陈伯达的这封信本是不用传达、不用公开的。但朱成昭自己却把信公布了。这就公开了朱成昭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了朱对中央文革的意见。于是地院马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闹出这么大动静，“造反派”竟然反戈一击，炮打中央文革，此举震动了京城和全国。

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想让他做个检查过关，“检讨归队”。但朱就是不听劝告，死扛着不作检查。1 月 24 日，朱进一步行动，召集叶向真、王大宾、蒋良朴、杨雨申、杜金山、梅建

明、张九九（最高检检察长张鼎臣女儿）等人到梅建明家开会。朱在会上分析文革形势，说：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许多管生产的干部都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抓生产？联动的人都是些中学生干了些坏事，但对这些小孩还是个教育问题，怎么都给抓起来、关起来了？朱又说，现在军委与中央文革有明显矛盾，中央军委是抵制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朱说，我们要站在军委一边。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干部过多过宽的问题，文革就可能最终要失败。而文革的失败，也是关系到我们造反派的大事。在这次会上，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师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帅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说，“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师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

此段时间，朱想向中央文革汇报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反映情况，但中央文革总是回复，没时间，等有时间再谈。朱等得烦了，对友人说“中央文革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1967年2月初，“东方红”整风小组要求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作出检查和交待。朱决定借整风之名，将观点全盘端出，让群众评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饭厅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这是个假检查，真炮打。这个会有三万多人参加。据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对朱的检查录了音，并保存至今。朱借检查之名，公开了他的八大观点：

1. 大串联搞乱了全国；
2. 整风、军训实无必要；
3. 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4. 中央文革抓人太多；
5. 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6. 中央文革太左；

7. 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

8. 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

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系统地批判中央文革，影响了众多对文革抱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检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朱的这个检查，要害是4、5、6三条，说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击面太宽，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便击中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要害之处，即使今天看来，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见，实为难能可贵。第3条，批评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恰恰说明“造反派”反对“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条说自己要站在中央军委一边，说明朱已从叶向真那里了解到中央几位老师、副总理的二月抗争，并选择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绝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离开了“东方红”核心组，被命令“闭门思过”，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不能倒。

此后，朱成昭被隔离居住，但一直拒作检查。1967年7月时，他和叶向真南下广州游玩，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令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广州抓回北京。而后朱、叶被隔离审查，再后来二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一专案当时被宣布为“叶朱反革命集团案”。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林矛盾日益突出，叶剑英再次获毛泽东信用，年底叶向真被释放回家。一年后，叶向真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301医院做了七年医务工作。1978年重回文艺界，以“凌子”的艺名导演了电影《原野》，反响热烈。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朱成昭的命运则与叶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从监狱放出来，受连累的蒋良朴、颜宽同学同时从监狱放了出来。但朱成昭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

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初随商业大潮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做得规模很大，后因种种原因失败。而后归隐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监村潜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57岁。据说朱去世前，写过不少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遗作，这要等待他的同学、好友、亲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与活着的朱成昭，同时树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朱成昭这个典型因叶剑英反对而被取消。宣传朱成昭难免会牵址到叶向真……

对于朱、叶的不同命运，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感叹：“想起孔丹的话：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老红卫兵，自认和朱成昭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具有本质的区别’。你就可以理解，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叶向真、朱成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结束语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枉、徬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他是走向觉醒的先知先觉者。

但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当时不曾像张志新那样，穷追到底，追踪文革错误路线至其罪魁祸首，这与那一代青年沉浸在“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迷雾中有关。朱成昭批判文革远不如张志新彻底。二是，他过于同情“联动”。虽然他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这是破坏法制。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说什么“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兵（指联动）掌权。”说明他仅是从路线上批判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过左，是太具破坏性。而认识不到四三派与联动争论的核心是：人应按血统分为高低贵贱？还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对的是权贵的特权。

朱认不清“联动”的实质，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党专制下的权贵特权制度。这方面，他受叶向真的影响应很大。他当时不可能达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经历启发人们，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1967年2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聂元梓的儿子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对笔者的长谈中，对此有深入披露。

大胖说：“1967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于是聂没有像朱成昭那样跳出来，而是采取了争取退出运动的较为安全的策略。

聂元梓、朱成昭，他们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在文革第一波浪潮过去之后，于1967年上半年，便会对叛逆发生叛逆？对造反进行造反？会不约而同地怀疑文革、反对文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异化现象。■

2018年9月2日

【述 往】

五年求学一场梦

——我的北大经历

杨海峰

—

1965年高考，是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是广西桂平县浔州高中（地处今广西桂平市）历史上高考成绩较好的一年，尤其是有四位同届同学一举考上北京的高校，实现了“跨长江，过黄河，上北京”的目标，令老师们特别振奋，多年以后都一直向后来的学生夸耀。我当年名杨木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班（62.5班）的黎清源考上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62.4班的韦柏忠、62.1班的林凤文（女）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我更是被赞誉为浔高少有的“才子”，因为浔高已多年无人考上北大、清华了。那时候，各家各户多是清贫的，能够拿得出钱供你读大学就不错了，没有哪家哪户像后来改革开放后那样搞什么入学酒、谢师宴，摆几十桌酒席大肆张扬的。

我在下湾老家与从乡下出来的黎清源会合后，搭轮船上贵县（今广西贵港市），与韦柏忠、林凤文会合，先乘普通火车上柳州，再改乘特快火车去北京。火车经过三天三夜的疾驰，从广西柳州跑了2300多公里，终于到达我们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我们被守候在那里的高年级同学接回了各自的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广西能够考上北京大学的极少，中文系高年级有一个男生我不认识，64级有一个是平南的郑君华（后于贵州师大中文系任教授），经济系65级有一个姓苏的女生，听说化学系还有一个男生，我亦不认识。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万里挑一的高材生。我是怀揣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理想去北京大学读书的。

我们中文系新生共有三个班，其中1班是语言专业，2班、3班是文学专业，均为五年学制。我被分到了2班，至今我还数得出全班33名男女同学的姓名。还记得我的学籍号是

0765023, 07 是中文系代号, 65 指入学年度, 023 是我的号码。全年级共有同学 100 名左右。1 班的班主任是蒋绍愚老师, 2 班的班主任先后是孙玉石、黄修己老师, 3 班的班主任是黄冠洲老师, 安平秋老师做我们年级的政工辅导员。我们中文系男生住 32 楼, 女生住斜对面的 30 楼。学生宿舍楼都是一式的长方体四层楼房, 每个房间 3 张架床 6 个床位。每层一个公共洗漱间兼无间隔的卫生间。楼外有一个公共热水洗澡房。

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 助学金分三等, 一等 19.5 元, 二等 15.5 元, 三等 11.5 元。我家本来十分困难, 父亲早死, 母亲是家庭妇女, 已年老体弱, 有时帮人家带带孩子, 所得劳务费极少, 一个妹妹高小毕业后没有工作。1958 年以前, 我家尚有几块菜地, 所产青菜基本够吃, 这样还能减轻一点经济压力; 公社化以后, 城镇居民家庭的菜地全部被共产给生产队了, 每日的青菜都要买来吃, 经济压力加大了。每天饮用洗涤的清水都要去一里远的郁江挑, 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叔父家只有他一个单身汉, 他在合作总店做售货员, 工资收入很低, 但他坚守“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的传统观念, 一直接济着我们娘儿三人。我家与叔父家合住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屋, 他做货物保管员, 长期在总店住。我来北京上学的学费、路费都是叔父提供和筹措的。就我家的情况, 领一等助学金都应该。而我老老实实的填写“叔父接济一点”为经济来源, 老师就评我领三等助学金了。到北方读书, 天冷, 我们能申请棉衣裤, 我得了一套深蓝色的棉衣裤, 虽然比较宽大臃肿, 也总比没有好。

开学后一个月并没有上课, 而是整天操练正步走和走方队, 因为十月一日国庆节, 北京市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大学生正步走方队要从长安街西头往东经过天安门, 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 同学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天一早, 全校上千名新生在学校的东操场上反复训练, 在解放军官兵的指导下, 一二一, 一二一, 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直到符合要求。国庆节那天, 我们大学生一式的白衣蓝裤, 顶着烈日, 排着方队正步走, 各人只顾看前头并用余光扫描左右两边的人, 不要让自己出错了。经过天安门城楼前面时只往楼上瞥了一眼, 因为距离远, 看不清哪个是伟大领袖毛

主席。

终于上课了。第一堂课是专业教育，我记得是系主任杨晦作的报告。他说，你们可能都是怀揣着作家梦来报考北大中文系的，但北大中文系并不是培养作家的，我们培养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高级人才。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读北大中文系，以后做作家，系主任的讲话无异于给我当头泼了一盘冷水，想了很久都想不通。

大学授课不同于中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几个班的大课都集中去阶梯教室上，没有课桌，学生坐在一排排右边有弯把扶手的椅子上，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把笔记本放在椅子弯把上做笔记。自己班的小课则到小教室上，有课桌安放课本、笔记。古代汉语先后由蒋绍愚、倪其心老师教，先秦文学史由林庚教授教，现当代文学史由哪个老师教，我记不清了。教俄语的是俄语系一位老师。因为老师们都是上午上完课就走人，学生们下午自习，或去图书馆借书阅读。我下午多是去图书馆借阅《剧本》杂志，那是延续高中时的读书爱好，看了不少剧本杂志，做了不少摘录和读书笔记。我的俄语口语基础较差，过去中学时主要是笔试成绩好就得了，没有好好抓口语训练。到了大学后，老师经常提问，要用俄语口语回答，北京、上海、东北来的同学一个个都是口语钢钢的，呜哩哇啦流利极了。可老师偏偏经常提问我，我憋红了脸，磕磕碰碰答不上几句。之后早读只得经常练习和背诵俄语口语。走出北大之后，我学过的俄语知识便丢到爪哇国里去，连俄语字母表的读写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上现当代文学史时，老师组织同学们批判一本以前学生写的长篇小说《殊途同归》，4a 纸打印稿，1 厘米多厚，估计 10 几万字，记得是批判其白专道路主题的。这位学生在学期间就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说是才华的，却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并作为批判的典型而胎死腹中。这让我吃惊不小，觉得走做作家的路危险，说不定哪天就触线挨批了，这时才觉得系主任杨晦所讲的的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话有道理。

1965 年冬，中文系一边上课，一边组织各班批判《三家村》及《燕山夜话》，由老师带我们先后去新华铅笔厂、门头沟煤矿，向工人们宣传文化革命的形势，读报上的批判文

章给他们听，批判资产阶级大毒草，让我们投身到工人阶级队伍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学期结束，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学校竟没有让学生进行考试。

二

1966年初春，第二学期开学了，中文系依然是断断续续地上课，还组织同学们批判三家村。5月份，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们又学习这篇文章，批海瑞，批清官，感觉文化大批判的风声越来越紧了。

5月25日下午，听同学说，有人在第一大饭堂东墙贴了校长陆平的大字报，我赶紧和几个同学跑去看，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围着观看了。我挤到跟前去，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为聂元梓等7人，听旁边的同学说，聂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6人为哲学系教师。大字报指责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彭佩云与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沆瀣一气，在北大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他们得到了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大字报火药味极浓，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以至北京市委，所提问题十分尖锐，语气凌厉逼人，仿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到了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边缘。观看者议论纷纷。我是普通学生，来北大读书不到一年，对学校上层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称陆平、彭佩云领导的北大党委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反党集团”、“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论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一切党的领导干部坚决斗争，把他们“彻底摧毁”。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誉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下子，北大沸腾起来了，各系师生纷纷贴出了许多炮轰校系党委领导、教授的大字报。饭堂内外的墙壁从下至上都贴满了，学校还在校园竖起了许多大字报棚，钉上芦苇席，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纸张多是红色，还有绿色、黄色，色彩鲜艳，煞是夺目。课上不成了，我每天都是去看大字报。校外的人也涌进北大看大字报，校园里人山人海。

此后，北京大学同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一样，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北大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事情，真可谓“金猴奋起千钧棒”，“天翻地覆慨而慷”。

1966年6、7月份，北大校党委被改组，原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不久又撤走了。

1966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等连续三次来北大煽风点火，鼓动学生们造反。

然后中央文革扶植聂元梓当上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候补中央委员，成为响当当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1966年6月以后直至1968年夏军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北大成为“红色恐怖”的地狱，造反的各系革命师生纷纷揪斗批判校系领导和教授、教师以至学生，把他们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给他们戴上高帽，挂上写有“打倒……”“砸烂……狗头”等，姓名被用红墨水打了×的

侮辱性字样的硬纸牌，要他们在人前、台上低头、弯腰、跪下，接受批判斗争，甚至对他们进行毒打、喷气式抓揪、游街、监禁、抄家、劳改，校系领导、教授、教师、学生、工人被打死、自杀、致残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出现。

1966年8月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大中学校学生“红卫兵”，北大学生则走出去，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与各地造反派炮轰揪斗各省、市、地、县党委、政府。

在北大执掌大权的聂元梓，去上海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

聂授意新北大公社干将，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61名老同志为叛徒，使他们遭到逮捕入狱，其中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被折磨致死。

聂再授意新北大公社干将，炮制出《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于《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聂又授意指挥新北大公社干将，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1968年春夏，北大校内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拥聂、反聂两大派，由互相谩骂攻击的文斗升级为手执长矛对刺搏击的大规模武斗，占压倒性优势的拥聂派新北大公社多次发起向对方的攻击，在北京造成极坏的影响。

1968年8月，人民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主要负责人先为王连龙，后为迟群、谢静宜，他们主持了两派大联合、斗私批修、斗批改，把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推广到学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六厂二校”经验向全国推广。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以后，北大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把师生疏散到乡下或外地边劳动，边搞斗批改，中文系师生则徒步拉练去北京郊区的房山县山区鱼子山。

从1966年6月一直至1970年3月中旬把学生分配离校，近四年时间，北京大学都没有上过一堂文化课，一直在停课闹革命，唯一读的书便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和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平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总结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把在北京大学精心培育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样板经验推向了全国。

三

北大文革的四年时间里，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情。

北大在全国最早贴大字报，也最早在全国对校系领导进行炮轰夺权，对教授、教师、学生进行打倒批判，同样，也最早对这些专政对象上升到人格侮辱、肉体打斗以至迫害致死致残，在全国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起了很坏的“红色恐怖”领航作用。下面记录的，是我当时的所见所闻，以及近日在网上搜索到的：

1966年6月18日，哲学系部分激进学生背着工作组，率先在他们住宿的38楼楼梯口设立“斗鬼台”，把以陆平为首的几十个“黑帮分子”、“反动权威”抓来批斗，之后又将这些“牛鬼蛇神”在校园内游街示众。其它各系也纷纷效仿，分别在不同地点对本系领导、教授进行规模不等的批斗。这就是北大闻名一时的“6·18”事件。（所见及樊立勤：《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

1966年7月，中文系在学生宿舍32楼前召开批判会，批斗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系副主任向景洁以及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人，还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糊成白纸高帽，拿木棍对他们进行暴打。之后把他们赶进“劳改队”，要他们刷洗打扫学生宿舍32楼厕所。有一天，学生在程的头发中间剃出一个十字型凹槽，还把他卷在草席中用木棍乱打。8月24日，北大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红卫兵”来到程贤策和其连襟两家合住的单元抄家，用军用铜头皮带毒打程与其连襟，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脱不下来。9月初，程无法忍受这样的无穷折磨，带

了白酒和毒药，到颐和园后面的树林中服毒自尽了，死时 38 岁。第二天，32 楼外墙便贴出了声讨的大标语：“黑帮分子程贤策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1966 年 11 月 21 日，中文系 64 级男生陈树峥（23 岁）跳楼，脑浆迸裂而亡。1967 年 3 月 18 日，中文系 62 级女生沈达力（21 岁）服毒并投水自杀。“红卫兵”检查她的遗物，发现她生前的日记里，写有其家庭出身资本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心存苦闷疑惑等话。系里又召开了批判沈达力反动思想大会。1968 年 12 月 4 日，中文系 63 级女生刘平（23 岁）服毒身亡。

以上材料均出自于王友琴所写的《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一文。她在此文中列出了北京大学在文革中冤死的校系领导、教授、教师、学生、工人、家属共 58 人，另有地质学院附中一名学生偷偷爬进北大图书馆看书，而被抓住打死，北京大学实际上被打死、自杀死的无辜者共计 59 人。

此外，还有不堪凌辱而跳楼自戕致残的邓朴方（原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儿子，时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读书）、被掌权的聂派抓住毒打双腿膝盖打钉致残的樊立勤（时在北大生物系读书）等许许多多受害者。全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既培养了成千上万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流淌着许多无辜者的鲜血，萦绕着许多被独裁专政扼杀的冤魂！

莘莘学子向往的北京大学，却煮鹤焚琴，斯文扫地，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

北京大学，你身上发出的光辉光焰万丈，你地下掩藏的罪恶罄竹难书！

四

1966 年 7 月赶走工作组之后，在一片红彤彤的大字报海洋和热烈的欢呼声中，聂元梓先后当上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然而，质疑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看到有几篇大字报说她没有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压制民主，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引上歧途。我那时是拥聂派，想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出来讲几句反驳反聂派的话。当晚，我执笔写了一篇大字报，讲聂元梓怎么怎么做，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文革领导康生、王任重，包括江青同志的指示，一共列举了五六条，以之驳

斥反聂派歪曲事实的言辞，说你们要找聂元梓算账，有胆量就去找中央文革领导算账。通篇大字报没有一句是攻击中央文革领导的言论。为了达到轰动效应，在写标题时，有意顺着反聂派的思路，写成《找康生、王任重等同志算账去》。我写好大字报后，有两个同班同学看了，觉得有理，也签上名了，我们三人便将大字报拿去贴在第一大饭堂外墙上。不到半点钟，有人来宿舍通知我，说你们的大字报是不合适的，已经照相了，请你们赶快去撕掉。我赶忙去第一大饭堂，把这张大字报撕掉了。

1967年春，北大革命造反群众逐渐分裂为拥聂、反聂两大派。这时，原学校副校长、教授周培源等130多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指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这封公开信在校内影响很大，许多干部、教师和学生纷纷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我受这封公开信的影响，也加入了该兵团的07（中文系）纵队65.2“珠穆朗玛战斗队”。我虽然加入了反聂派，亦算不上活跃分子，没有再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过一次核心会议，只是普通的成员。

1968年夏两派大联合以后，我们65.2班的原拥聂派“新北大公社兵团”成员王春茂对我说，“新北大公社兵团”领导曾开会讨论是否要将我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时候，互相抓对立派的辫子，互相抓对方的“反革命”，是给对方造成被动的极有效手段。多亏了王春茂同学向他们解释，说这个同学家庭极贫寒，个人表现很老实，其大字报的出发点只是保聂的，只是在标题上有哗众取宠、吸引注意之嫌；加入反聂派后，也只是是一般成员，没有过激的行为。加上在他大字报签名的两个同学还是我们“新北大公社”成员，你们要抓他，那我们的两个同学怎么办？他的斡旋终于使“新北大公社兵团”头头高抬贵手，放了我一马。

然而这张大字报一直成为我的心病，因为我点了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后做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康生大名了啊，只要有人翻这个旧账，就会让我吃不消。

康生 1975 年死了后，我的心病还没有解除。1980 年，中共中央开除康生党籍，裁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清算其在文革中的罪行。此时，压在我心头多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由此我总结出，当年的自己年轻单纯，缺乏政治头脑，很容易受激进思潮煽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并非好事，皇城脚下，是非之地，历来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书读不成，还差点惹祸上身，让人不寒而栗！

五

1968 年 3 月 28 日晚半夜，同学们正在熟睡，忽听楼道里有人急跑高喊：新北大公社的人袭击 31 楼井冈山的人了，大家快去救援！我被惊醒了，赶忙胡乱穿上衣服，跟着同学们急急往下跑。赶到 31 楼外时，楼外的电灯正亮，我刚在离 31 楼十几米的地方停步，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一下闷击，鲜血汨汨地流了下来。抬头一看，31 楼顶，有几个人正不停地往下扔砖头。与我一样，好多人头部被砖头砸伤了。我捂着伤口往回跑，有人在 32 楼楼道门口给我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让我上车，赶快将伤者运往地质学院重新包扎急救。

当晚，被送往地质学院急救的伤者有几十名北大学生。有伤者说，这是“老佛爷”（对聂元梓的蔑称）、新北大公社预先策划的一次袭击，是为了在肉体上打垮我们，聂元梓们已经流氓到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

在地质学院住了约一周，病情稳定了。我思来想去，去北师大找在那里读书的同乡叶桂福吧，他讲过，让我有事去找他。叶桂福是北师大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我到了他那里，他得知我的遭遇之后，便热情地收留我住下来。他的同室同学大多离校了，只有他与另一位同学没有走。（注：叶桂福，广西桂平县桂平镇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长治二中任教，文革初期曾回桂平煽动炮轰县委、县政府。）

我不敢把自己在校受伤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和叔父，他们知道的话肯定伤心得不得了。我在北师大住了二十天左右，头顶偏右的颅骨被砸破了，幸好没有被感染，现在基本愈合

了，只是在砸破处隆起了一个半厘米的疙瘩（这个被砸破的颅骨疙瘩过了十几年才平复）。又了解到北大暂时平静了，便告辞叶桂福回北大，仍然住 32 楼。班上、系里许多人都离开了学校，远离这是非之地。实际上，在我受伤去外校休养的一个月时间里，北大又发生了几次惨烈的大规模武斗，武斗造成了 200 多人受伤，当然伤者大部分是井冈山派的，同时公私财物大量损失，我的被铺衣物书籍也多不见或毁坏了。学校已面目全非，新北大公社占据了十几座宿舍楼，形成了对井冈山占领的 5 座楼的包围。我所住的 32 楼变成了战时壁垒，所有窗户和楼道门都被用木板和大铁钉死，一层楼道全部用双层架床相连，架床中间的横杠和床板被拆除，顶上再铺上床板钉死，中间可以行人，地下挖了一人高两人宽可通行的地道，亮着电灯，能够通行到井冈山占据的其他楼房。原来能够进出的学校南门被新北大公社占据了，井冈山扒开靠自己所属楼房的围墙作为外出通道。近日从网上发布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知，新北大公社开始从 4 月份逐步对井冈山实施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已占领了校外的一个饭馆做据点，在里面装上杀伤力很强的大弹弓，对这几座楼实行封锁，准备继续升级武斗，一举攻下井冈山的几座楼，把井冈山摧垮消灭。如果不是解放军、工人宣传队 8 月份进驻学校，井冈山所占楼房一旦被新北大公社攻占，井冈山人恐怕要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杀红了眼的新北大公社决不会对敌对阵营的任何人心慈手软，手下留情！

现在回忆，当时我仅仅是考虑家里经济困难，在学校住，尚能领取助学金保证生活费，又看到井冈山据点的防护搞得蛮坚固，坚信新北大公社不能轻易攻占，所以就没有离开学校。后来想起，实在后怕，对于占据着雄厚物质资源的掌权派新北大公社，要消灭井冈山易如反掌，我一介文弱书生，哪能轻易逃出魔掌！为了眼前利益，罔顾长远利益，这种侥幸心理十分的鼠目寸光，极为愚蠢，极不可取！

六

文革的残酷争斗使原本单纯的同学情谊蒙上了阴影，好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之前情同

手足的好朋友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形同陌路的陌生人或你死我活的仇敌。然而，依然有一些男女同学没有被恶劣的政治高压扼杀了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仿佛在笼罩着黑暗、专制、狂热、迷茫氛围的夜幕上画上了一抹美丽的亮色。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女生极少，能进北大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北大中文系 65.2 班就只有 6 个女同学。除 1 人不知其芳心所许与谁之外，其余 5 人均在北大期间名花有主了，她们或与同班才子帅哥热恋，或与外班白马王子倾心，这几对情侣恋人成了许多人艳羡的对象。

雷渝平，65.2 班女生，长得娇小美丽，是中文系与全校公认的校花，追求她的人肯定不少。她出身高干家庭，其父是老革命，文革前官至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文革中靠边站。文革初期，雷渝平因与其他高干子女对江青不满，议论其劣迹，被人告发，中文系遂把她作为“反动黑帮子女”进行批斗。在批斗会场，雷渝平胀红着脸，低着头，咬着嘴唇，显示出“我自岿然不动”的镇定神态，任由批判者上纲上线，并没有流露出花容失色、落魄悲观的表情。

1968 年军工宣队进校以后，雷渝平被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她与我们原井冈山派的同学关系比较好，经常同我们去学校的游泳池游泳，拿自己的小相机来邀我们去拍照。她天真活泼，嘴巴又甜，调干生曹鸿飞最喜欢称她为可爱的“小不点”。工宣队安排东北来的男同学王凤超做她的转化工作。我们几个与王凤超要好的同学得知了他和雷渝平的恋爱关系之后，都祝贺他是“转化红花开，抱得美人归”。1990 年代，听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说，王凤超已做到国务院驻港澳办副主任，雷渝平亦在香港有较好的发展。

中文系 65.2 班另一美女陈愉庆，上海人，能歌善舞，是学校文工团的演员。中文系 65.3 班男生马大京，北京人，小提琴拉得悠扬婉转，极为动听。1968 年军工宣队入校之后，在学生中开展斗私批修，马大京将自己所写并秘藏的日记呈给军工宣队，请他们帮自己斗私批修，提高思想觉悟。这下可好，朴实纯真的马大京正好撞在枪口上，军工宣队把他的日记公布出来，将他对文革的不理解、迷惑、反感上升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大暴露”，

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开了全系批斗会批判他。

马大京被批斗后，苦闷之中，晚上在所住宿舍走廊尽头的窗口拉小提琴释怀。如泣如诉的曲调吸引了陈愉庆的注意，陈愉庆经常来到32楼4楼走廊，倾听马大京拉小提琴，并请马大京教她。一段令人动容的凄美爱情由此开始了。在这政治高压的年代，陈愉庆竟敢爱上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是需要多么大的胆识与勇气！毕业分配时，陈愉庆得到了分配，而马大京还带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北大被监督劳动。1980年代初，我在书店看到他们夫妇用“达理”作笔名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才得知他们成了国内知名的专业作家，我甚为惊喜，便买了下来。后来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后移居美国。

李炳海，东北人，65.2班才子。史桂芹，东北女孩，65.2班同学。他们是我们班最早在人前展示为恋人的一对。北大两派用高音喇叭论战时，李炳海被井冈山头头看中，让他去井冈山广播台写稿，他常在对方开播时便能立即写出反驳文章供井冈山广播台跟着播出，被誉为“急才”。后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后又调出北京，在人民大学中文系做教授。

隗和海，籍贯不详；孙玉琴，女，上海人。二人均系65.2班同学，亦是较早在人前展示为恋人的一对。后来，隗做了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

薛洪，女，北京人，65.2班同学，其男朋友为65.1班的周嘉祯。后二人均在中国科学院的什么部门工作。

此外，中文系65.2班还有一些男生与其他高校的女生恋爱着。如王春茂，江西人，其女朋友系中学的同学，在北京某高校读书。王毕业时分配留校，后做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夫妻俩退休后去加拿大跟在该国定居的女儿、女婿颐养天年。周从涛，湖北人，其女朋友亦系中学的同学，在北京某高校读书。周后做到湖北一地级市报总编。

经历过文革非常岁月的同学们，大多夫妻恩爱，长相厮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

是我们这一辈人尤其觉得能够聊以自慰的地方。

七

1970年3月，正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鱼子山与农民战天斗地，又自我斗私批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被通知马上回学校。原来是提前给我们分配了，同时分配的还有63、64等年级的同学，我被分配回广西柳州市，至于各人所做具体工作，大多不知，还有不少同学被分配去全国各地的军垦农场。因为没有学习完必修的课程，没有学习成绩的鉴定，学校没有给我们发放毕业证，即后来具有一定含金量的大学毕业文凭。离校之前，同班同学没有照一张毕业合照，没有吃一顿毕业饭，没有互相话别，五年的同班同学如同互不相干的陌生人一样，各奔东西了。

北大的五年就这样过去了！

五年求学一场梦啊！

坐上由北往南北京至柳州的火车，回望着五年前第一次踏上的万众向往的神圣之地，我的心头竟然没有产生半点留恋之情。车站贴着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大标语映入眼帘，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在耳畔回响，想着自己本是具有高端人才潜质的高材生，而今沦落为平庸的“三无”（基本无书读，无专业知识，无毕业文凭）之辈，感到前途一片渺茫，不禁悲从中来，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哐当、哐当……”火车启动了。

我的心情是那样的苦闷、抑郁、迷茫、怅惘……■

2018.08.27，贵港

【述 往】

我与北师大

——社会主义教育（二）

蒋世信

上课了，大一开的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党史和体育。

数学分析教材采用的是苏联数学家菲赫金哥尔茨（1888—1959）编著的《微积分教程》（共八册）的压缩本《数学分析原理》（共四册），菲氏是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他编写的《微积分教程》权威而闻名世界。解放后，我国综合性大学的数学系大多采用此教本。教我们数学分析的是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副博士研究生（54—58）毕业的孙永生副教授，助教是年轻有为的陆善镇老师。我们都特别爱听孙先生的分析课，也特别爱上陆老师的辅导课，完全是一种精神享受。后来才知道，孙先生在函数逼近论有精湛的造诣，彻底解决了逼近论中的一个难题“ W_1^1 可微函数类的三角最佳逼近的精确常数的计算”，首先提出利用可数的线性信息族在 Sobolev 类上的最优恢复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陆善镇老师主要研究调和分析和函数逼近论，对长达 36 年未解决的多重 Fourier 级数强平均收敛的局部化问题给予彻底解决，开创了国际上对高维实 Hardy 空间逼近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等，获得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创新性成果，得到国际数学家的高度评价。1995—1999 陆先生任北师大校长，毕竟是学者，仅仅任了一届。

高等代数教材是系主任张禾瑞与郝秉新编著的《高等代数》，张先生 1935 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留学德国，46 年回国任北大数学系教授，52 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北师大数学系任教，56—82 年任系主任。教我们“高代”的是王世强副教授，研究数理逻辑，他把多值逻辑、布尔值逻辑、甚至模糊逻辑中软布尔值逻辑统一为格值逻辑来研究，得到一批奠基性的概念、方法和定理（被称为王氏定理），得到国际数理逻辑界的肯定。

解析几何教材是华东师大数学系系主任孙泽瀛（1911—1981）教授编写的《解析几何

学》，教我们的是陈绍菱（女）讲师（79年任副教授、87年任教授），陈先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当时《解几》的助教是杨存斌老师，记得一次辅导课，杨老师布置了一道题（原题忘了），没几分钟我就解出并说出答案，杨老师挺惊讶，问我怎么解的，我说用了抛物线的光学原理，他让我到黑板写出解题过程。本来这道题他要用后半堂课进行讲解，看到我的解法简洁明快，杨老师很赞许，期末我的《解析几何》被评为优，可能这也是主要原因吧？

65年传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春节讲话，谈到“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学生课业负担太重，要砍掉三分之一”，“农大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开卷考试，允许交头接耳，抄也可以吗！”等等、等等，……，我们年级的教学力量大大地削弱了、数学知识也砍掉了许多。

72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中学或大学。都是师出同门的同学，分在高校、有进修深造访学的机会，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成了教授、副教授；分在中学，知识水平是越来越抽抽、直至抽缩到高中水平，为了高考升学率、为了学生的前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最让我佩服且自愧不如的是，我们年级一班的陈木法同学，文革中就没放弃过学习，偷偷自学数学、虚心请教先生、不懈努力钻研学问，在概率论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以陈的名字命名的定理、方法、构造等有8种，成为我国的一个“学派”，在国际上颇有影响，2003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获得具有突出贡献的数学家称号。而我们呢，一来没有木法的天分，二来整天忙忙碌碌、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注：以上的科研成果摘自1915—2015北师大数学科学学院史（第3版），还有些先生的数学科研成果斐然，由于没教过我而未摘录。]

大学里社会活动还是很多的，比如65年参加中日青年联欢，和三千名日本大学生在大会堂观看民族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煤矿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演出：胡松华的《赞歌》、朱明瑛的《伊呀呀奥莱奥》、邓玉华的《五彩云霞》、集体舞《洗衣歌》、还有口技、杂

技等等让人特别享受，最后是芭蕾舞《天鹅湖》的精彩片段：王子与天鹅的湖边会面，演了有40多分钟，我个土包子看不懂、差点儿睡着了。

迎接外宾，我们总是在三里河到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段路的两旁，举着来宾国家和我国的小国旗，口里不住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其实，大家并不在意来宾、而关注的是迎接他们来访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或陈毅、张茜，刘少奇、王光美等。65年4月迎接阿尔巴尼亚二号人物谢胡，特别隆重、要求“立体式”迎接，我们穿着国务院外事局下发的各种民族服装（我穿一身蒙古服、同学叫我“胡松华”，那个美），大家热情洋溢地跳着民族舞、大声喊着“热烈欢迎”。那次迎宾确实与往次不同，迎宾车队不时地停下，周总理陪着谢胡一起向群众招手致意，……。可是，归国后、没有三个月、（人民日报刊出）谢胡被霍查以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打倒了，“他们不是亲密战友么？怎么成了野心家？”那时，在我脑海里实在不可思议。

参加六五年国庆游行的国家仪仗队，我校出一个10人一排的百人女子护（国）旗方队，身高1.7米，长得漂亮最好、一般也可以，但要“条顺”且有长辫子。师大女生近三分之一，但有长辫子的不多，我班只有许桂琴同学合格；还要出一个百人一排的千人男子红旗方队，身高1.75米，我参加了。从五月份练队，开始个人踱正步，然后五人一排、十人一排、……。直到百人一排。百人正步挺难走齐的，开始十步还行，接着就成了蛇形，气的教练直骂街：让你们两眼余光看左右，怎么就自顾自往前走？余光看美女行看左右就不行啦？！……。

经过艰苦的训练，终于走的有模有样了。九月廿六日晚十点在天安门广场彩排，十月一日凌晨我们穿一身白（上衣是自己的、裤子是仪仗队发的），每人扛着一面红旗走到靠近东华表的位置等候着。上午十点国庆大典开始，彭真市长讲完话游行开始，国家仪仗队最先走过天安门，我们两臂伸直举着红旗、从东华表昂头挺胸正步走过西华表，然后才便步整齐地往西走。为避免游行“梗阻”，前面的队伍要赶快疏散，走到南礼士路我们乘国庆指挥部派来的大巴返回学校，这时电视还在直播，文艺大军刚刚走到天安门。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特别令人兴奋。金水桥前面的一片区域基本上划分给清华、北大、北师大，然后左右南三个方向依次下推、才是其他高校、中专、中学、中央或市直机关单位、医院、商业、厂矿等。广场上，华灯初上灯火辉煌，轮廓灯把天安门、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前门箭楼，箭楼左右两侧的欧式建筑装饰的更加庄严典雅漂亮，布在远处四周的探照灯的光柱投射在广场中央上空，有时光柱一起有规律的左右摆动，非常壮观。各个单位各自为政、在划定的区域内围成人圈歌舞活动；广场四周及东西长安街上的、音质音色都很标准的高、低、中音喇叭混合在一起，一首接一首地播放着革命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五彩云霞》、《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等等，伴着每首悦耳的歌曲、跳着不同舞步的集体舞，大家忘却了一切烦恼、尽情地跳着舞着唱着闹着狂欢着。广场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没有文艺细胞的我也忘乎所以地动情地手舞足蹈起来，……。

八点之前，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与民同庆同乐，八点钟放焰火了，五颜六色、花样繁多，有的像菊花、有的像牡丹、有的像散落的珍珠、有的带有叽叽喳喳的小鸟叫、有的带有尼龙布制作的小降落伞徐徐降落（大家争抢），打到空中的烟花布局也十分讲究，让人如入仙境。15分钟之后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再放，仍然是15分钟。天安门广场的节日狂欢令人难忘，也让我永远怀念那激动人心的美好时刻。

65年10月下旬，我们年级的全体同学参加兴修水利即京密引水渠二期工程的劳动，住在农业大学腾出的空屋、铺上稻草、睡在地铺上。每天清晨从农大步行到东北旺挖京密引水渠，中午在工地吃饭，劳动强度很大，晚上收工返回农大安歇，整整干了一个月才回校学习。京密引水渠是北京有名的人工运河，源自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流经怀柔水库、颐和园昆明湖、最后在滨角段汇入永定河引水渠，其中自昆明湖至玉渊潭一段就是有名的昆玉河。当时，农民工、解放军战士及北京高校学生为劳动主力。现在运河及其两岸修整的更加美好幽静，偶尔有游船经过，漫步在河两边的林荫小道上，感觉像江南特别优雅惬

意。

六五年已经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不正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么？那时心里有这样的疑惑但不敢讲），说它是阶级调和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学校请来曾到美国旧金山出卖苦力的华工做报告，然后吃忆苦饭，记得饭厅的好多女同学把忆苦饭偷偷倒入泔水桶里。那天学校综合商店食品柜台的面包饼干等都脱销了；数学系请来我班许桂琴同学的父亲——门头沟煤窑的老矿工做忆苦思甜的报告。

那段日子，话剧演的是《千万不要忘记》，电影演的是《箭杆河边》、《夺印》，戏剧演的是《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歌曲唱的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特别是，这年北京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北师大是试点，由华北局高教工委书记吴子牧带队进驻师大，开始每天 16:00——18:00 政治学习，后来改成整个下午停课政治学习，反修防修、自我思想改造，深刻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系里的先生和老师们都分配到各个班里，和同学们一道参加社教运动。

我记得，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检讨自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出身地富、资本家的谴责自己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的生活。”“骨子里流淌着剥削阶级的血，要背叛自己的阶级，誓死跟党走。”出身一般劳动者的批判自己是：“过着跟猪一样的生活，只知索取不知奉献。”越是自我褒贬、自我羞辱、自我作践，越算思想上自我改造得好，我检讨自己：政治方向不明确，重业务轻政治，几乎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反正是越往脑袋上扣大帽子、“狗血喷头”才好。

那年月，人人努力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一块砖、任党随便搬’，处处学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上车让座、购物排队、尊老爱幼蔚然成风。我班的许桂琴、胡春如、张光明三位同学先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羡慕。

社教给我敲响了警钟：不能钻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突

出政治要靠近团组织，积极随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到西单商场站柜台，我被分配到卖鞋组，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腿疼的，实践告诉我们售货员的工作也是挺辛苦的；像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全国劳模张秉贵（1918—1987）的“一抓准”，那是百炼才能成钢的；那时候能跟时传祥（1915—1975）掏粪都感到非常荣幸，但排不上队。

我们就和西城区环卫工人（好像是肖英华联系的）、背着粪桶去新街口街道居民院掏粪。木制的粪桶挺沉，还要从厕所里掏出粪便倒入里面，然后背在身上，走出院子倒进停在街上的粪车里。我们缺乏锻炼、一来没劲二来不会背，背在背上的粪桶里的屎尿直晃动，洒到头上往下流，恶心死了也不敢说，即使臭也是香，因为它“兴无灭资”、改造了我们资产阶级的臭思想。……，

回校后，赶快把衣服扔到水池里泡着，用开水烫用自来水反复冲；人跑到宿舍楼下面的淋浴房，打几遍肥皂（那时很少用香皂）擦洗全身，真闹不清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了。

66年2、3月，北京各报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我们也写文章参与批判，记得中国青年报的一位编辑将我的稿件退回并附了一封信，指导我要写如何受《燕山夜话》的毒害。噫，原来写大批判的文章是工农兵的事，我们学生只配写如何受毒害的，我按照编辑的提示，写了篇受毒害（其实，我也就看过《燕山夜话》的两三篇文章如“两个鸡蛋的家当”，“对联有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等等）的文章寄去，可是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那样的文章已经不合时宜，五月底还是六月初，带有编号的我的那篇文章原稿退回。

平地一声炸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六月一号晚，中央电台新闻联播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地震颤；六月二号，我校谭厚兰等人在北饭厅，也贴出炮轰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的大字报，停课闹革命，师大的文革正式开始了。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 阚玉瑶之死（十六）

陆伟国

疯狂迫害的恶浪不但吞没了许多校系领导干部和知名知识分子，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1966年9月7日在宿舍上吊自杀，那天正是周恩来在人民大学开红卫兵大会的日子。

尽管在那个“我哭豺狼笑”的血腥日子里，有那么多的人死去了，就像最高指示讲的：



“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当我们听到阚老师的噩耗时，依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震惊，事先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阚老师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和政治按说没有什么牵扯，更没有卷入到某些斗争里，平常对我们学生很友好很和善，怎么就是这样也还是被恶浪所吞噬。我们的心里无法

（俄语教研室合影，中间左一是阚玉瑶）接受。好像前面有那么多黑五类、走资派在被批斗、被残杀，怎么在身边、在身后也有人倒在血泊中，那种震颤那种愕然，甚至超过了悲伤。

阚老师生于1932年2月，原籍山东，是位优秀的教师，教学很认真很负责，对同学很和蔼很友善。那时中学的外语教学条件很有限，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就更不行，所以我们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外语基础都不好，学得都挺费劲。阚老师不厌其烦，从字母发音开始，很耐心地教我们。俄语里有个卷舌音，几个偏远地区来的同学就是学不会，发的那个怪声音，教室里常常哄堂大笑，阚老师也是很友善地和我们一起笑，而后还是一遍遍地认

真纠正。据我所知，阚老师的同事们对阚老师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所以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尽管已经是腥风血雨，已经是惨剧连连，也想不到这样的正值中年的好老师，怎么就那样地结束了生命。那壮实的身材、和蔼的笑容、那典型的有磁性的男性音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悲惨地消失在恐怖的血色中。也正是这些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使我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那时的社会状况，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打着革命旗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阚老师的死因，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什么“罪行”，完全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压力所造成。在阚老师关系比较近的人里，有个叫姚中原，校团委书记，前面提到过他。阚老师的自身要求和他家庭对他的要求都比较高，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因此就和姚来往比较多，想靠拢下政治上比较强的人。不料姚在文革初期急于表现自己，较早贴了大字报，反对校党委，言辞比较偏激，还涉及到了周恩来，结果被一些人拉出来批斗了。又有人因为阚老师跟他关系比较近，就此也贴了阚老师的大字报。由于之前姚曾经向阚老师透露过他还知道赫鲁晓夫有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连阚老师的亲属也要他和姚划清界限，起来检举揭发。这本意也是怕火烧到自己家里来。但阚老师平常就是个耿直的人，也是个谨慎的人，这使得他觉得很难办，非常紧张、思想压力很大。

那些天，他没言没语，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他看到外面那些批斗的场面，戴高帽，挂黑牌，栓铁链，倒上墨水，罚跪罚爬，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要说“我有罪、我有罪”。阚老师对陪在他身边的母亲说，叫这些人以后怎么活呀。对左倾灾难的恐惧终于压垮了他。他害怕社会上越来越残酷而看不到头的打击终将会落到他的头上。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自身的压力，重重的压力使他完全感到绝望。在他母亲离开后的第三天，他就在宿舍里的门后面上吊，撒手人寰，自尽身亡。

阚老师最后竟然也没能留下骨灰，现在哈尔滨与妻子林莉合葬墓里的是他的一块欧米伽金壳手表和一套他自己未曾穿过的，送给了弟弟的中山装。

其实，阚老师有个不一般的革命家庭，但这反而给他带来了更不一般的结局。他的妻子林莉有着不一般的家世。她是张浩的女儿，是林彪的远房侄女。

张浩，又名林仲丹、林育英，一生经历曲折复杂。他 1897 年生，1922 年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入党，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一位资深领导人。张浩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比林彪年长 10 岁，林彪还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



1930 年 4 月，满洲省委被破坏，张浩奉命去奉天代理省委书记。与当时的省委秘书徐克峻假扮夫妻一起工作，不久就生活在一起，成为夫妻，次年有了林莉。但当年 11 月张浩即被捕，在狱中受严刑拷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32 年 1 月，

（左起：林彪、张浩、毛泽东在延安合影）因伪“满洲皇帝”溥仪登基而颁布大赦，在付了 300 元赎金后，张浩出狱。1933 年 1 月，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去苏联。次年，徐克峻带着林莉也去了苏联。1935 年，张浩为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回国。随后，在解决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件中，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对加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抗战爆发后，任一二九师政委。因疾病加重，回延安改任职工学校校长等职。1942 年病逝。当时，毛泽东书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且是在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亲自抬棺出殡。

得说明的是，出现在出殡队伍右侧的是张浩的原配妻子涂俊明（1897-1988 年），和他们的儿子林汉雄（1928 年生，解放后担任过建设部长等职）。涂俊明是张浩在老家时娶的妻子。张浩在去东北之前，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涂俊明和孩子林汉雄跟在身边。在张浩去东北之后，涂俊明与组织失去联系，其中 1932 年至 1935 年，她和孩子还被关在狱中。因音讯全无，张浩才和徐克峻又在东北结为夫妻。直到 1938 年涂俊明找到延安，与张浩重逢。那时徐克峻已被苏联专政机关关押在西伯利亚劳改。

林莉于1934年随母去苏联，1938年寄养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1947年加入了苏联国籍，1949年进莫斯科大学读书，1954年毕业，同年回国，到人民大学任教，1958年调入广播局，1962年恢复中国国籍。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期间，林莉担任了苏联国安部门的情报员。这项工作表面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也就是向组织汇报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打个小报告什么，实际上林莉做了没有也无从查起。但到了文革，这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是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了。



文革一开始，广播局对林莉进行了审查，得出了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局领导把她的审查结论送给中央审批。江青得知后大怒，说：“林莉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这样，事情整个儿就

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时的照片，前排左二为林莉。）翻过来了。其实江青根本没搞懂，她讲的林莉，不是这个林莉，而是另外有个人，（叫林利。那是林伯渠的女儿也叫林利（与“林莉”读音相同），比林莉年长，也在苏联多年，专攻哲学。50年代初，斯大林派著名的哲学家尤金来华，毛主席经常会见他，常常彻夜交谈，就是这位年长的林利做翻译。为了区别两个林莉（利），俄文翻译界称林莉为“小林莉”，而年长的林利为“大林利”。五十年代，江青在莫斯科治病时，“大林利”给她当过一段翻译，对江的作风极不满意，因而得罪了她。文革一开始，“大林利”就遭受迫害。连这个“小林莉”，也因为江青没搞清楚而一起倒了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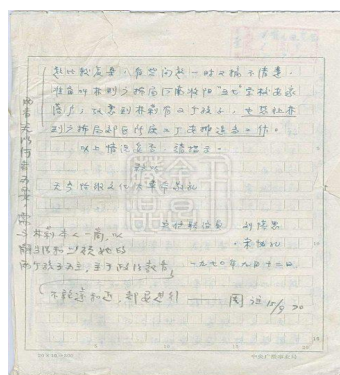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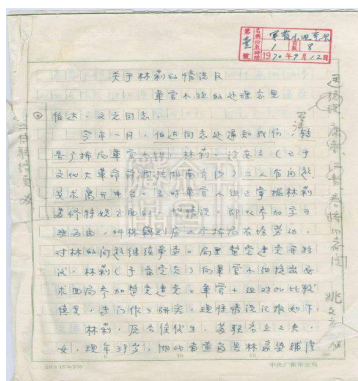
阚老师死后，他妻子怕牵连到子女，忍着心中的血泪不敢去领回他的遗物。就是这样，事情也没有半点的好转。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横遭造反派的批斗。到

北京仅一年多，1968年9月，这位倔强的老人为抗拒街道上造反派的批斗审查，以死相拼，也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打重伤致死），倒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

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生于1902年。她家是云南蒙化的大户望族。父亲徐咸泰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担任过云南镇雄县县长和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在他的影响下，徐家的徐克峻七兄妹参加革命。她自己就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先后在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地的地下党领导机构工作。并在工作中与张浩从结识到结合。1933年张浩赴苏，她带了林莉于次年也去了苏联。1935年张浩奉命回国，徐克峻没有一起回来。不料，第二年就被斯大林政权在“肃反扩大化”中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解放后，经蔡畅等人出面，徐克峻才得以回国，1952年回到昆明。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

林莉，就在这两年的时间接连失去两位最亲的亲人，那是多大的打击啊。而她自己1968年就开始被审查。林彪事件后，再一次受牵连。1972年2月，还被列为专案，关进所谓的“学习班”，隔离审查了三个多月。她虽说是林彪的侄女，其实相互并没有什么往来。1991年，林莉参加了张浩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仪式，而在新闻报道中却没有她的名字。

林莉于1996年离世。留有两个孩子。



（广播局军管小组1970年9月12日向陈伯达、姚文元提交的《关于林莉的情况及军管小组处理意见》。第一页右侧为姚文元的批示，第二页左侧为周恩来批示。）

阚老师的外孙女看到了这一段，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她说，她没见过她外公，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了有关她外公的记叙，很感谢这段文字。她还补充了她家庭的一些情况。

这份回忆录在网上连载之后，有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和笔者联系，除了对回忆录表示肯定，也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本人在此一并深表感谢。（主要参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林彪远房侄女林莉一家的文革遭遇”，朱华，中华网论坛，2011-5-16 16:46；《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最近，阚老师的女儿林红也和我取得了联系。她说，在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之后，她们家也站立了起来。她弟弟在美国高校任教，她在美国最大的一家癌症医院工作，都已事业有成。她对还能想到她们、牵挂她们的人，表示感谢。

然而，学校领导和老师被迫害致死，还在不断发生，至今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连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如我系计划教研室的吴景超教授、法律系的何思敬教授等也相继被迫害致死。何教授是被新人大“学工农”战斗队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于1968年4月14日死于积水潭医院。她女儿何理良的丈夫是外交部长黄华，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周得知后，在7月10日给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写批示说：

“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事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以私捕私抓，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问，决非善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这批示，后来也没起作用。等到工军宣队来接管学校后，被审查的教职工，死状更惨烈。■

【封面】

前进地后退

邹 行

这是一个游行中的少年，他手举红宝书，向红太阳高呼万寿无疆，向革命理想献上忠诚与热血。他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昂首挺胸，为自己成为“伟大时代”的前驱先锐骄傲无比。他坚信自己在勇往直前。实际上，他只是身躯向前，双腿行走的方向却朝后。那扭曲的身体，隐喻着精神的吊诡，行为的荒谬。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我们追随着主流、自以为在追随着真理的时候，时代的双腿却大踏步地带我们走向落后。■

【资 料】

周培源在新北大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总部举行的 “彻底批判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晚)

革命小将们，革命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年多来，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获得了一次次的胜利。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决战性的阶段，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好形势。我们新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是大好形势。六月五日晚上，陈伯达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指

出了在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的问题。伯达同志的这个严肃批评，特别是对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现实意义。他的这个重要讲话，使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扭转错误的方向，指点我们朝着正确的航向。当然，扭转错误的航向，还需要我们作艰苦的斗争。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让我们为伯达同志的正确指示而热情欢呼！

革命小将们！革命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今天的讲话。

我今天是来下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当你们的小学生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你们成立了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你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给全校革命师生极大的鼓舞。我一定坚决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你们的鼓舞下，我们老一辈的革命教职工也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主席思想挂帅保持晚节，紧跟主席闹革命，和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近十日来，校园里的很多同学、同志关心我对学校问题的观点。我忠心地感谢同学们和同志们对我在政治上的关怀。按最高指示的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人说，我已经是北京公社的社员。这对我是个莫大的荣誉。老实说，从主席思想的掌握程度，政治立场、思想水平、斗争的顽强性等方面来考察，我还远远不够具备做一个社员的条件。但是我坚决拥护北京公社的主张：聂元梓同志必须向广大革命群众作触及灵魂的检查，孙蓬一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孙蓬一靠边站！

革命的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强调，我今天来是向小将们和同志们学习的。在陈伯达同志的六.五指示以前，很少有人敢说校文革犯过比较大的错误，甚至在一个时期凡是有人给聂元梓或孙蓬一同志提实质性的意见，就在乱棍齐飞之下被打成“逆流”。在六.五指示之后情况起了本质的变化，校文革犯了很大的错误是肯定的了。

我只想谈一个问题。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在三月二十七日来我校举行座谈会，是一件重要大事。他们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来学校在高等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行战略部署的工作。他们要我们学校在斗争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总的号召下，紧抓校内的斗批改，提出新的教学改革方案，要新北大为其他学校的斗批改树立一个新榜样。我们可以问：在孙蓬一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的校文革接受了陈伯达同志的战略部署了呢？我看没有，完全没有！和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完全相反，孙蓬一挥舞大棒，借整风的机会整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谢富治副总理。在社会上以抓吴传启为名，把矛头指向兄弟院校，大搞分裂，从而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如果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司令员，不服从最高统帅的指挥，打乱战略部署，从而贻误军机，这一个司令员该受到怎样的军法处理？（众：撤职罢官，靠边站！）现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新北大这个重要阵地上就出现了孙蓬一打乱最高统帅战略部署的问题，我们还能继续容忍他当我们的司令员吗？不能！绝对不能！

革命的干部和教职工同志们：

我们很多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很多人在旧社会里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在陆平黑帮统治时代，又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迫害。以三反分子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在我校贯彻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人又成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受害者。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在校文革成立之后，没有能够很好清除，使得学校的很多干部与教职工长期受到压抑，长期抬不起头来。只有在今年《红旗》杂志第四、第五两期社论发表之后，在听到了毛主席的召唤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开始舒畅起来。但是由于校文革没有很好地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不少革命干部没有得到解放。在目前这个大好革命形势的时刻，我们全校的干部与教职工应该抓住时机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同时，也要造我们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反。在旧北京大学时代，就有“大北大主义”。看来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把“大北大主义”肃清，反而在新的形势下“大北大主义”又滋长起来。我们有些人总觉

得他们自己高人一等，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阿斗，看不起群众，看不起那些和自己共过患难的战友，看不起兄弟院校，甚至看不起领导。这样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思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在这次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彻底肃清各个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遗毒，深刻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我们要按照林副统帅的教导：“把自己当作一份革命的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

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两个 95%，把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校的斗批改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新北大建成一个名符其实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最后让我们高呼：（口号略）■

胡宗式注：这份材料是 2018 年 9 月 30 日网购得到的，原为打字油印件。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